政治科學論叢／第 82 期／民國 108 年 12 月／頁 39-80

十九世紀末朝鮮的中國認識之背景與「脫中」問題*

朴炳培**

摘　要

十九世紀末朝鮮代韓國對「中國」的認識可分爲三：「作爲地區霸權的中國」（清朝）、「作爲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之中國」（明朝）、以及「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小中華意識）。甲午戰爭結束後，朝鮮雖然「脫離清朝的朝貢體系」，卻脫離不了明朝的遺產與小中華意識。即，在受到文明論影響之下，朝鮮社會對於「脫中」問題上引起分歧。首先，激進開化派依據進化論的文明觀念，正面質疑華夷觀念，並沒有把清朝與「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之間劃清界線，並將清朝（以及中國文化）視爲阻礙朝鮮文明開化之傳統象徵，從而主張全面脫離「中國」。其次，穩健開化派在西方文明和東洋文明的價值觀之間儘量保持中立，在「小中華意識」的歷史經驗上添加了「文明論」，從而指出「東洋」概念。也就是說，當代朝鮮儒教菁英將中華傳統文明和西方近代文明劃等號，從而主張保存中華文明的朝鮮能與近代西方文明國並肩而立。在此立基點上，朝鮮改國號爲「大韓帝國」，毫無猶豫地採用中國傳統象徵符號，以展現自主獨立國家的姿態。這些認識及思路，在今日仍有助於我們對當代問題，進行深刻而有新意的省思。作者希望透過本研究的成果，讓學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再一次認識到儒教思想在韓半島的發展軌跡。

關鍵詞：中國、朝鮮、小中華意識、脫中、文明論

---

* DOI:10.6166/TJPS.201912_(82).0002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E-mail: easianpark@gmail.com。

收稿日期：108 年 11 月 1 日；通過日期：108 年 12 月 23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擊敗清朝後，朝鮮改國號爲「大韓帝國」，從而展現出自主獨立國家的姿態，並致力於近代化。然而，從現代韓國人的角度來看，可以發現十分詭異的一點：即，大韓帝國高舉自主獨立國家的旗號，但其皇帝卻像明朝皇帝般在圜丘壇舉行「祭天儀式」，展現出中華文明繼承者的姿態。其實，當時發行的兩大報紙對大韓帝國的成立及象徵有不同看法。首先，激進開化論者發行的《獨立新聞》[1] 將東洋文明比喻成「病毒」，[2] 從這樣觀點出發，《獨立新聞》表面上肯定朝鮮高宗（第 26 代國王，在位：1863～1907）的稱帝，並將這樣情況視爲「朝鮮逐步成爲獨立國的徵兆」，[3] 但實際上對大韓帝國皇室採用中國傳統象徵符號並沒有給予高度評價。再則，具有儒教背景的穩健開化論者發行之《皇城新聞》[4] 認爲，大韓帝國的

1　《獨立新聞》（發行期間：1896 年 4 月 7 日至 1899 年 12 月 4 日），是韓國最早的民間報紙，發行韓文版和英文版。是由因甲申政變失敗而流亡美國的徐載弼回國後所創辦的，當時朝鮮政府亦資助他創辦報紙所需的 4400 元經費。當時朝鮮政府支援《獨立新聞》創刊資金的理由是爲了啓蒙人民，同時也是爲了對抗當時日本人發行的《漢城新報》。《漢城新報》的經營者表面上是日本民間人，但實際上是以日本外務省的機密補助金所創刊的。即，從 1895 年 2 月開始，日本在漢城發行了《漢城新報》，通過該報紙將日本侵略朝鮮的行爲正當化，或者刊登誹謗朝鮮皇室的報導，朝鮮政府經常向日方提出抗議。因此，朝鮮政府不僅支援《獨立新聞》的創刊資金，也提供減免報紙寄送費用的優惠，甚至提供便利的採訪活動。《獨立新聞》發行初期的報紙論調是國民啓蒙，對朝鮮政府採取了非常合作的態度。但進入 1897 年後，朝鮮政府內部開化派和守舊派之間的對立加劇，《獨立新聞》也漸漸受到守舊派主導的朝鮮政府壓力。尤其，從 1897 年 8 月開始，俄羅斯派遣軍事教官和財政顧問干涉朝鮮內政並掠奪各種權力後，《獨立新聞》對朝鮮政府的批判態度變得更加強烈，之後與朝鮮政府持續保持對立關係，並於 1899 年 12 月停刊。

2　《獨立新聞》（漢城），1898 年 9 月 19 日。

3　《獨立新聞》（漢城），1897 年 10 月 1 日。

4　《皇城新聞》（發行期間：1898 年 9 月 5 日至 1910 年 9 月 15 日）爲採用國文混用體的報紙。雖說是「國文混用」，但幾乎都是用漢字書寫的以漢文爲主的文章，打破了自《獨立新聞》出版以來，多家報紙以純韓文發行報紙的傳統，因此受到了當時儒教知識階層的歡迎。《皇城新聞》的發行團隊有著生於儒生家庭的身份背景，因此自然就有了學習儒教經典的教育背景。他們當中有人出國留學，還有機會到國外考察，增長見

臺灣大學 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成立是獨立國家行使主權的一部分，且更進一步企圖復原過去的東洋文明。[5]

以上的情況，顯露出十九世紀末朝鮮代韓國人對「中國」有多種認識。也就是說，十九世紀末朝鮮代韓國（以下簡稱「朝鮮」）對「中國」的認識可分爲三：「作爲地區霸權的中國」（清朝）、「作爲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之中國」（明朝）、以及「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小中華意識）。甲午戰爭結束後，朝鮮雖然「脫離清朝的朝貢體系」，卻脫離不了明朝的遺產與小中華意識。即，在當代朝鮮社會受到文明論影響之下，儒教菁英將中華傳統文明和西方近代文明劃等號，從而主張保存中華文明的朝鮮能與近代西方文明國並肩而立。在此立基點上，朝鮮改國號爲「大韓帝國」，並提出韓中日三國共榮論。韓中日三國共榮論的宗旨是韓中日三國以互相承認各國自主權爲基礎，而從同心協力對抗西方帝國主義。這些認識及思路，在今日仍有助於我們對當代問題，進行深刻而有新意的省思。作者希望透過本研究的成果，讓學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再一次認識到儒教思想在韓半島的發展軌跡。

本文分成六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爲前言。第二部分從君權力加強的條件與政治菁英的價值觀兩方面敘述明朝與朝鮮關係的發展軌跡，並指出它呈現「作爲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之中國」（明朝）的特徵。第三部分敘述朝鮮形成並強化「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小中華意識）的歷史軌跡。第四部分敘述滿清入關以後清朝與朝鮮關係的演變。第五部分則檢討十九世紀末朝鮮對於「脫中」問題的複雜思維。第六部分爲結論。

識。其次，他們大致都參與到包括獨立協會在內的愛國啓蒙運動團體。因此，他們發行的《皇城新聞》與愛國啓蒙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第三，《皇城新聞》不但支持大韓帝國的君主立憲制改革，而且在經營困難時還得到了高宗皇帝的資金支援。此外，《皇城新聞》對日本採取的態度非常微妙。即，當日本對朝鮮顯露出侵略意圖時，《皇城新聞》保持非常批判的態度，但同時強調重視日本作用的三國共榮論。然而，到 1905 年日本掌握大韓帝國的外交權並在大韓帝國設置統監府後，《皇城新聞》持續受到日本的打壓，於 1910 年停刊。

5 《皇城新聞》（漢城），1898 年 9 月 2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貳、「作為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之中國」：明朝

一、十五世紀：謀求政治利益

明朝皇帝與朝鮮國王在朝貢體系框架下謀求彼此之間的政治利益。明皇帝透過朝貢制度讓周邊國家承認中國的最崇高地位，並建構以明朝爲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朝鮮國王則參與朝貢體系而確保政權正當性（Chun, 1968: 2-3；全海宗，1966a：40；1966b：274）。然而，明清朝與朝鮮關係並不是典型的宗藩關係，而是前近代東亞國際關係史上極爲特異的例子（尹榮寅，2002：269-290）。[6] 早期朝鮮國王在君臣權力分配上面臨兩大困境。首先，中央政治菁英擁有鞏固的實力。即，朝鮮開國並不是征服或國內革命的結果，而是前朝（高麗，918 年至 1392 年）中央政治菁英推進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結果。就這一點而言，高麗與朝鮮的交替只限於王室的交替，前朝的政治菁英依然是早期朝鮮朝廷的主要政治菁英（Duncan, 2000；鄭杜熙，1983：7-56）。而另一方面，參與朝鮮開國的政治菁英之政治理念爲程朱理學，這種理念強調王道政治以牽制君王的專制。要言之，參與朝鮮開國的政治菁英，不但具有鞏固的政治實力，而在此政治理念上肯定由朝臣主導的政治體系。

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爲鞏固君權與朝鮮王室的正當性，朝鮮太宗（第 3 代國王，在位：1400～1408）與朝鮮世宗（第 4 代國王，在位：1418～1450）運用雙重戰略：首先，這兩位國王展現出優勢的個人實力（武力或政績），以牽制臣權；而另一方面，通過與明朝皇帝深厚的君臣關係，致力於確保朝鮮新生王朝的國際地位和王室的正統性（Clark, 1998: 278；朴元熇，2002：117-166；鄭東勳，2012）。

實際上，當明朝與朝鮮關係惡化之際，朝鮮國王比較容易陷入內部反對勢力的挑戰。以朝鮮太祖（第一代國王，在位：1392～1398）爲例，朝

6　韓國學者尹榮寅強調，朝貢體制是明朝初期的制度改革和體系化的產物，進而明清與朝鮮之間理想的關係是歷史上極爲特異的例子。因此，將它看作前近代國際關係的典型，這種視角是西方學界「中國中心的文化論」的產物（2002：269-290）。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鮮太祖即位之後，立即以「權知高麗國事」（並不是「朝鮮國王」）名義對明朝報告關於「威化島回軍」和易姓革命的正當性而請求承認新王朝。[7] 對朝鮮這般的請求，明朝透過禮部咨文表明高麗問題並非中國干涉之事，同時傳達以邊界不發生混亂的前提下能夠維持友好的外交關係，並進一步要求迅速更改國號問題。[8] 爲此朝鮮再派使節請求「和寧」（李成桂出生地名）及「朝鮮」兩國號選一，[9] 最終依明朝選定的「朝鮮」爲國號。[10] 然而，明朝對朝鮮仍有疑心，卻遲遲不願意承認朝鮮太祖的君主地位。[11] 對此，

---

7 《朝鮮太祖實錄》1 卷，1 年（1392 年）8 月 29 日（戊寅）。作者使用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2015）的「《朝鮮王朝實錄》服務系統」，引用了《朝鮮王朝實錄》相關記錄。本網站於 2006 年開始提供《朝鮮王朝實錄》原文(漢文)和韓譯文的網路閱覽服務，從 2008 年開始提供《朝鮮王朝實錄》與《高宗太皇實錄》和《純宗皇帝實錄》的全部原文和韓譯文以及原版圖片（JPG 檔）。《朝鮮王朝實錄》並不是特定時期或特定的人物有意企劃編纂的歷史書，而是歷代朝鮮朝廷中每當國王被更替時所編纂的書籍。在此基準上，從初代朝鮮太祖到朝鮮哲宗，472 年（1392 年至 1863 年）間 25 代國王的實錄僅包括在《朝鮮王朝實錄》的範疇內，並於 1997 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日本朝鮮總督府曾在 1927 年至 1932 年間編纂了 26 代國王朝鮮高宗與 27 代國王朝鮮純宗的實錄，但韓國歷史學界認爲，這些最後二朝的實錄，不但在日本侵犯大韓帝國主權相關紀錄與皇帝或皇室相關紀錄中，有很多歪曲的內容，而且也不符合朝鮮時代嚴格的實錄編纂慣例。因此，讀者在參考《高宗實錄》和《純宗實錄》的記錄時，應注意這些問題。

8 禮部咨高麗權知國事。洪武 25 年 10 月 11 日，本部右侍郎張智等官於西角門，早朝將來辭奏聞，欽奉聖旨：「高麗前者差人來奏本國情由，今覽來辭，不過前日之事。然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易。高麗限山隔海，天造東夷，非我中國所治。爾禮部回文書，聲教自由，果能順天意合人心，以妥東夷之民，不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文書到日，國更何號，星馳來報。」欽此，本部今將聖旨事意，備云前去。(《朝鮮太祖實錄》2 卷，1 年（1392 年）11 月 27 日（甲辰））。

9 《朝鮮太祖實錄》2 卷，1 年（1392 年）11 月 29 日（丙午）。

10 奏聞使韓尚質來傳禮部咨，上向帝闕，行謝恩禮。其咨曰：本部右侍郎張智等，於洪武 25 年閏 12 月初 9 日，欽奉聖旨：「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欽此，本部今將聖旨事意，備云前去。(《朝鮮太祖實錄》3 卷，2 年（1393 年）2 月 15 日（庚寅））。

11 本部尚書門克新等官奏：「朝鮮國王遣知門下府事鄭摠，詣闕請印信誥命。」奉聖旨：「……今朝鮮在當王之國，性相好而來王，頑嚚狡詐，聽其自然，其來文關請印信誥命，未可輕與。朝鮮限山隔海，天造地設，東夷之邦也，風殊俗異。朕若賜與印信誥命，令彼臣妾，鬼神監見，無乃貪之甚歟？較之上古聖人，約束一節，決不可爲。朕數年前曾勅彼，儀從本俗，法守舊章，令聽其自爲聲教；喜則來王，怒則絕行，亦聽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朝鮮太祖樹立遼東攻伐計劃以防備明朝的威脅（朴元熇，2002：33-113）。在如此的情況之下，朝鮮太祖的五子李芳遠（後來即位爲太宗）發動了第一次王子之亂，並取消遼東攻伐計劃，更逼迫朝鮮太祖退位。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發動政變即位的朝鮮太宗和明永樂帝（在位：1402～1424）之間的互動，逐漸編制了鞏固的明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即，發生靖難之役後，明建文帝（在位：1399～1402）爲對抗永樂帝而向朝鮮要求進獻馬匹，朝鮮利用此情況請求冊封，因此，建文帝沒提出異議就承認朝鮮定宗（第 2 代國王，在位：1399～1400）和朝鮮太宗（朴元熇，1980：93-112）。而明永樂帝即位不久之後，朝鮮對明朝請求重新承認，而明永樂帝爲了展現天子權威，乃承認了朝鮮國王。就這一點來說，政權之間互相承認的這種關係，是依照朝貢體制而展開的政治選擇（朴元熇，1983：93-112），從此以後，「一年三貢」成爲明朝和朝鮮之間的慣例。

更進一步說，朝鮮太宗與朝鮮世宗試圖把這種階層化的國際體系擴展到國內政治體系內，確立明朝天子－朝鮮國王－國內士大夫之階層化的政治體系。例如，早期朝鮮王室的禮制基本上繼承了前朝高麗的「天子之禮」，不過朝鮮太宗與朝鮮世宗根據《春秋》，卻十分積極地將各種禮制降爲「公侯之禮」（Kye, 2004: 107-130）。這種制度改革，有助於確立明朝天子－朝鮮國王之間階層化的政治體系，從而制定高於國內政治精英（士大夫）之朝鮮國王的特殊地位。

至十五世紀中葉，朝鮮王朝的政權得以鞏固，朝鮮國王的正當性基礎似乎轉向於國內。例如，1452 年朝鮮朝廷優待高麗王室的後裔，並使他奉祀高麗王室。[12] 而朝鮮世祖（第 7 代國王，在位：1455～1468）在表面上與明朝維持禮節性的往來，但在女眞政策上卻與明朝產生矛盾並受到明天順帝的斥責（Kye, 2010: 41-66）。不僅如此，朝鮮世祖不顧朝臣的反對，在圜丘壇舉行祭天儀式。1897 年成立大韓帝國以前，在朝鮮王朝歷史上主持祭天儀式的君主則唯此一例，絕無僅有（金相泰，1996：193-223）。

其自然。爾禮部移文李某，使知朕意。」（《朝鮮太祖實錄》9 卷，5 年（1396 年）3 月 29 日（丙戌））。

12　《朝鮮端宗實錄》1 卷，即位年（1452 年）5 月 19 日（辛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要言之，在十五世紀朝鮮，對明關係是朝鮮國王主導的，而且當朝鮮國王的國內政治必要性和明朝皇帝的政治必要性呈現一致之際，乃展現出明朝與朝鮮關係更加深化的特性。

二、十六世紀：理念性關係之深化

雖然十五世紀明朝和朝鮮的關係飛速發展，但雙方關係發展的基礎爲彼此的共同利益。然而，進入十六世紀後，共同價值成爲了更重要的雙方關係之基礎。也就是說，從十六世紀開始，明朝與朝鮮之間宗藩關係表現出在理念上強化的傾向（Walker, 1971: 314）。

但作者認爲，國際因素只是必要條件，朝鮮國內因素則是充分條件。於十六世紀初，在朝鮮朝廷內部君臣權力平衡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由於朝鮮燕山君（第 10 代國王，在位：1494～1506）的暴政，使群臣密謀廢除朝鮮燕山君，並擁立朝鮮中宗（第 11 代國王，在位：1506～1544）爲君主——中宗反正（1506 年）。剛即位的朝鮮中宗難免受到（中宗反正）功臣的束縛，因此朝鮮中宗謀求登用「士林派」以牽制功臣勢力。但是，士林派過分強調推進道學主義政治改革以牽制君主的專制，導致朝鮮中宗的權力受到限制（李秉烋，1999；車周泳，2004）。

在這種局勢下，朝鮮中宗所選擇的戰略是，在國內與士林派聯合而推進政治改革，以加強政權的穩定性，同時通過強化與明朝的理念性關係，塑造朝鮮國王的特殊地位。此是政治基礎脆弱的朝鮮國王依靠現實（朝貢體制）和理念（儒教）最頂端的天子權威，以確保國王自身的政權安全和權威的戰略（桂勝範，2014：94-108；Kye, 2010: 41-66）。即，當明嘉靖帝因「大禮議」面臨朝臣的強烈反對之際（Geiss, 1988: 440-450；Mote, 1999: 658-668），朝鮮中宗不顧國內的反對派遣進賀使，表現出積極支持明嘉靖帝的姿態（具都暎，2006：345-376；桂勝範，2014：69-108）。具體而言，朝鮮中宗接到明嘉靖帝追封親生父母「皇帝、皇后」尊號的消息之後，[13] 欲

[13] 下謝恩使申鏛先來通事書狀曰：「此言『皇帝加上昭聖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康惠皇太后，加上興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加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如此則我國亦當有進賀之事乎？其問于承文院、禮曹以啓。」（《朝鮮中宗實錄》51 卷，19 年（1524 年）6 月 22 日（乙卯））。

臺灣人文暨社會期刊資料庫

派遣進賀使卻面臨朝臣的大力反對，[14] 因此朝鮮朝廷派人向遼東都司詢問朝鮮派遣進賀使之可行性與否，[15] 並獲得肯定的回覆。[16] 此後，雖然朝廷內仍有反對意見，但朝鮮中宗依舊派遣進賀使。[17] 1536 年，明嘉靖帝建成九廟，同時將兩位皇后加號爲太后。隔年，朝鮮中宗獲知此消息後下令朝廷審議進賀之可行性與否，[18] 雖然大部分朝臣反對此事，但在國王的主導之下乃決定進賀，[19] 並收到明嘉靖帝肯定的回應。[20] 此事強化朝鮮中宗的權威並使他掌握對明關係的主導權。

到 1538 年 9 月，明嘉靖帝追尊明永樂帝爲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生父朱祐杭爲睿宗獻皇帝，並將睿宗獻皇帝神主祔於太廟，並改其陵墓名爲顯陵。對此，朝鮮中宗在未收到明朝公文的情況之下，不顧朝臣的反對急速派遣進賀使。[21] 此時，明嘉靖帝的祔廟行爲得不到國內的支持，因此明皇帝特別款待朝鮮進賀使節，[22] 並以朝鮮的表文

14　《朝鮮中宗實錄》51 卷，19 年（1524 年）6 月 27 日（庚申）至 30 日（癸亥）。

15　承文院都提調啓曰：「今中國加上尊號，有曰本生皇考；本生聖母云。於進賀使文書內，書本生等語，似無例，請令押解官一人，先領唐人，往問遼東。」傳曰：「依啓。」（見《朝鮮中宗實錄》51 卷，19 年（1524 年）7 月 12 日（乙亥））。

16　押解官　璶，還自遼東，齎遼東移咨（原註：以加上尊號，令我國進賀之咨。）而來，又謄書遼東進賀京師表文以啓。（《朝鮮中宗實錄》51 卷，19 年（1524 年）8 月 21 日（癸丑））。

17　御夜對。侍講官沈思遜曰：「近者，中朝於加上尊號，不當去本生二字，而小人輩，皆請去之，擧朝士大夫，請存二字者，皆受罪。今於是非紛紜之時，我國以海外之邦，先爲進賀，則無乃助成其邪論歟？」上曰：「中原之事，非我朝所得以是非之也。議論時方紛紜，外國似不合先賀，然此慶事，不得不已也。」（《朝鮮中宗實錄》52 卷，19 年（1524 年）10 月 7 日（戊戌））。

18　傳于政院曰：「今觀冬至使書狀，中朝九廟既成，又上尊號於兩宮，此似當賀。雖無公文，可以聞見進賀乎？此必有古例，問于承文院。」（《朝鮮中宗實錄》83 卷，32 年（1537 年）1 月 3 日（癸未））。

19　關於此事的爭論過程，參見《朝鮮中宗實錄》83 卷，32 年（1537 年）1 月 4 日（甲申）、1 月 23 日（癸卯）至 28 日（戊申）、2 月 27 日（丙子）、2 月 29 日（戊寅）。

20　皇帝喜詔書未到而先賀，別有勑賜，故本國使臣，先送我啓達于殿下矣。（《朝鮮中宗實錄》84 卷，32 年（1537 年）4 月 30 日（戊寅））。

21　《朝鮮中宗實錄》88 卷，33 年（1538 年）10 月 11 日（甲亥）；《朝鮮中宗實錄》89 卷，33 年（1538 年）11 月 10 日（庚辰）、11 月 16 日（丙戌）。

22　臣觀帝意，自追上皇天及獻帝之號，朝廷有非之者，而海內布政司，時無進賀者，帝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資料庫

告廟，以宣示祔廟行爲的正當性。[23]

總而言之，明嘉靖帝與朝鮮中宗通過使節的往來，強化自身的權威，從而形成一種合作模式。在此我們不可忽略的是，朝鮮中宗能夠實現這種戰略的主要背景，是因爲十六世紀初朝鮮政治菁英自任爲中華世界的一員—就是「小中華」。對於如此的狀況，下面將作進一步且詳細的闡述。

參、「作為文化體系的中國」：小中華意識

朝鮮以程朱理學立國，認同華夷觀與正統論，尤其是朝鮮開國以來，由國家來主導儒教書籍的普及，以推動深化儒教化的政策（崔承熙，2005：85-151；Deuchler, 1992: 111-118）。因此，像朝貢體系這種階層化的政治體系對朝鮮政治菁英具有一定的說服性，從而加強了國內政權穩定。從十六世紀前半部開始，朝鮮政治精英將朝鮮視爲小中華的現象尤爲顯著，此與朝鮮的國內外局勢變化有關。進入十六世紀以後，朝鮮國內的儒教化更加深化，而朝鮮與琉球和日本地方勢力及女眞等建構了將朝鮮國王作爲最頂端地位的朝鮮式朝貢制度（朴正珉，2014；韓成周，2009；Robinson, 2000: 121-122）。[24] 早期朝鮮爲了本國邊界的穩定，對女眞勢力和倭寇展開了軍

意殊未快焉，見臣之至，喜極，故令親進表文，又特賜宴矣。其時唯浙江進表耳。(《朝鮮中宗實錄》，34 年（1539 年）5 月 3 日（庚午））。

23 對此事朝鮮朝廷的反應，可以參見《朝鮮中宗實錄》91 卷，34 年（1539 年）7 月 22 日（丁亥）。傳于政院曰：「觀鄭世虎書狀，有大儀表文告廟等事。予意以爲，上國，豈以我國表文告廟乎？必上國所製之表也。觀其書狀文勢，似指我國之表文，此古今稀罕之事也。」；此外，可以參見《朝鮮中宗實錄》90 卷，34 年（1539 年）7 月 24 日（己丑）。以我國表文告廟，在所當謝也，但皇帝以表文告廟，非所以優待我國也，以此而誇示天下也。

24 在此不可忽略的一點是，參與以中國爲中心的朝貢體系的周邊國家，也與本國的周邊勢力形成了小規模的朝貢體系，日本、越南等也不例外。如濱下武志所言，在朝貢體制框架下，朝鮮、日本、越南等與它的周邊國之間形成了「小朝貢體制」(1997)。古田博司則指出，被中國看成夷狄的周圍國家，對它反撥而學中華思想，因而中國和周圍國家之間形成了「中華思想共有圈」(1998)。此外，韓國學者閔斗基認爲，在中華（或中國）中心的秩序裡存在（朝鮮、日本、越南等的）「小中心」秩序，因而將前近代東亞地域的多層的秩序看作在「中心」和「周邊」之間能動的互相轉換下產生出來（2001：39-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外交的努力（朴正珉，2010；金普漢，2014；張俊赫，2014）。然而，朝鮮長期對女眞和日本採取的政策，比起軍事行動，更注重通過朝貢貿易建立友好關係：一方面，授予女眞諸部的酋長官職，以利他們與朝鮮方便進行貿易（韓成周，2006），其中，豆滿江流域的女眞諸部在協助朝鮮防禦北邊的同時，與朝鮮建立了最緊密的關係（朴正珉，2014）；另一方面，朝鮮對日政策雖然也採取了類似方式，但比對女眞政策更加複雜。朝鮮初期對日外交表現出多元的、重層的面貌，即朝鮮國王與幕府將軍建立了基於敵禮關係的交鄰外交，則與包括對馬島主在內的壹岐島主、九州節度使、大內殿、小二殿等地方勢力展開了基於羈縻關係的交鄰外交（韓文鍾，2004；2014：314-320）。比起地方控制力較弱的室町幕府將軍，朝鮮更加重視倭寇集團的本部日本地方勢力的關係，特別是與對馬島的關係更加緊密。例如，從朝鮮開國初期到壬辰倭亂發生時期（1592 年）之前，日本地方勢力赴朝鮮漢城入貢的次數共達 4,842 次，其中對馬島入貢的次數爲共達 2,385 次（占 49.3%）（韓文鍾，2013：86-89）。除此之外，值得關注的是，朝鮮和周邊勢力之間的這種互動方式，源自於明朝的朝貢制度。朝鮮就像本國對明朝採取君臣關係的形式一樣，使豆滿江流域的女眞諸部和對馬島倭人等向朝鮮稱臣。從 1443 年起，朝鮮確立了與女眞勢力及日本地方勢力交流的禮儀規範（韓成周，2014：166-167），同時顯露出將豆滿江流域的女眞諸部和日本對馬島視爲朝鮮的藩籬之意識形態（韓文鍾，2011；韓成周，2010；2012）。[25]

[25] 隨著朝鮮式朝貢體制的成立，從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末壬辰倭亂發生之前，朝鮮邊界大體上保持了穩定狀態，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但是，這種穩定狀況的長期持續並不代表朝鮮完全控制了周邊入貢勢力。首先，參與朝鮮式朝貢體制的女眞勢力還參與以明爲中心的朝貢體制，表現出「兩屬」的性質。即，明朝與朝鮮各自利用衛所制度和受職制度與女眞諸部建立了羈縻關係，女眞諸部爲了與明朝和朝鮮進行朝貢貿易，接受了明朝和朝鮮的官職。因此，當時女眞諸部被授予明朝或朝鮮官職並不意味著被編入兩國行政權內（韓成周，2007）。以十五世紀的情況爲例，明廷在女眞地區設置的 184 個衛所中，有 80 多個衛所（占 43%）女眞酋長曾赴朝鮮漢城被朝鮮朝廷授予朝鮮官職（河宇鳳，2003：255）。另一方面，日本對馬島也具有「兩屬」的性質。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後期，在日本室町幕府對地方的影響力難以發揮的情況下，對馬島參與朝鮮式朝貢體制，長期持續頻繁的相互作用，直到江户幕府建立之後，也成爲了朝鮮朝廷和江户幕府之間的外交管道，其兩屬性質得以延續（韓文鍾，2013）。這樣

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期刊專用章

在此基礎上，朝鮮政治精英對於承認明天子賦予了更重要的政治意義。例如，對於十六世紀朝鮮兩大巨儒李滉（1501～1570）[26] 和李珥（1535～1584）[27] 而言，朝鮮對明朝天子的事大政策，已成爲與儒教價值不可分離之事。這種趨勢在萬曆朝鮮之役（韓國稱壬辰倭亂）時期更加強化，朝鮮朝廷將明朝出兵援助朝鮮之事視爲「再造之恩」，因此十六世紀末朝鮮對明朝的依存度達到頂點（韓明基，1999：67-88）。

在朝鮮地方基層士大夫的層面而言，爲了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地方揭竿而起的朝鮮義兵之目標，不僅僅是單純地想維護朝鮮的領土，還擊退了威脅明朝主導的中華秩序之夷狄，以守護中華文明。換句話說，由朝鮮地方基層士大夫主導的抗日義兵活動，是根植於儒教國家朝鮮追求的「春秋大義」，因爲這樣，我們必須從朝鮮士大夫自任爲中華世界的一員（既小中華）的框架來看，才可以正確理解朝鮮義兵的對日抗爭（桂勝範，2012：5-37）。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小中華意識並非只是朝鮮單方面的想法，還得到了明朝方面的肯定。例如，自從十六世紀以來，造訪朝鮮的明朝使節將朝鮮描述成小中華，[28] 不僅如此，明朝萬曆年間嚴從簡所纂述的《殊域周咨錄》，此書中表揚朝鮮時，經常留下如「其俗自箕子施八條之約，乃邑無淫盜，柔謹成風」、「朝鮮素秉禮教，有箕子謨範之遺化」等作爲結語（1993：46）。特別是，朝鮮對中國儒教文化、制度以及思想吸取之情況，讓明朝官僚對「箕子朝鮮說」倍加關注，從而形成「深受儒教文化的朝鮮」

來看，雖然朝貢體制的中心和周邊之間建立關係形式上君臣關係，但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堪稱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

26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春秋》大一統者，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大明爲天下宗主，海隅出日，罔不臣服。（見李滉著，「禮曹答日本國左武衛將軍源義清」，《退溪全書》8 卷）。

27 臣聞下之事上，不以夷險而易其心，不以盛衰而廢其禮。能行此者，惟我國家之事中朝，是也。（中略）何謂義？今夫以小事大，君臣之分已定，則不度時之艱易，不揣勢之利害，務盡其誠而已。（李珥，「貢路策」，《栗谷先生全書》拾遺卷之四）。

28 義州宣慰使李克墩啓曰：「去年天使祁順初到，我國禮遇甚倨。其還也，言曰：『朝鮮實是知禮之國，其稱小中華，非虛語也。』稱嘆不已。」（《朝鮮成宗實錄》1 卷，1 年（1523 年）3 月 14 日（甲辰））。

臺灣人文暨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象。[29]

在這種情況之下，朝鮮政治精英雖然面臨明清交替的對外環境變化，卻難以與明朝絕緣。舉出朝鮮光海君（第 15 代國王，在位：1608～1623）爲例，朝鮮光海君拒絕明朝的派兵要求之後，大舉肅清曾強烈反對自己中立外交政策的親信勢力（大北派），導致政權的凝聚力暫時減弱，西人黨趁機發動政變，推翻光海君政權另立仁祖（第 16 代國王，在位：1623～1649）爲王（仁祖反正）（桂勝範，2007：1-37）。另一方面，朝鮮仁祖當初將「廢母殺弟」和「背明親後金」做爲廢掉光海君的理由，以加強仁祖登基的正當性。[30] 因此，他即位之後一反光海君的中立政策，採取了親明政策。於是在 1627 年，後金入侵朝鮮，結果朝鮮與後金議和，約爲兄弟之邦。然而，朝鮮仁祖的此舉正面打擊了仁祖反正的正當性，從而面臨了政權正當性的危機（桂勝範，2008：439-478）。因爲這樣，朝鮮仍舊保持著與明朝的關係，並不承認 1627 年的盟約。於是 1636 年，皇太極以背盟毀約爲由，再次派兵入侵朝鮮，結果朝鮮仁祖向皇太極投降。從此以後，朝鮮成爲清朝的藩國，並徹底斷絕了與明朝的關係，但朝鮮內部反清聲浪卻越來越強（吳洙彰，1985：49-119；韓明基，2003：53-93）。滿清入主中原之後，雖然清朝在東亞朝貢體系取代明朝，而清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在表面上長期維持禮節性的往來，但朝鮮政治菁英仍把清朝視爲夷狄，因此朝鮮不能接受清朝的正統性，更無法從清朝的朝貢體系中獲得政權的正當性。

朝鮮孝宗（第 17 代國王，在位：1649～1659）即位之後企圖北伐，表現出了依武力來對付清朝的姿態，但是朝鮮孝宗的北伐計劃並沒有實現性，且於朝鮮孝宗駕崩後停止下來（金世英，1998：121-153；孫衛國，2007：85-98）。在此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北伐計劃可以彌補朝鮮孝宗在宗法上的缺點。即，朝鮮仁祖的嫡長子昭顯世子（1612～1645）於 33 歲暴死，以

29　大學士李東陽贈順詩曰：聖代山川盡海隔，朝鮮東面一藩如。冠裳舊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漢詔書。（中略）祁順序曰：余仕中朝，聞外國之有文獻者，以朝鮮爲稱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道，匪直守箕子遺教而已（嚴從簡，1993：22）。

30　當初朝鮮仁祖政權所提出的廢掉光海君的理由，可以參見《朝鮮仁祖實錄》1 卷，1 年（1523 年）3 月 14 日（甲辰）。光海聽信讒賊，（中略）至若戕兄殺弟，屠滅諸姪，搒殺庶母，屢起大獄，毒痛無辜。（中略）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

臺灣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嫡長繼承制而言，應當將昭顯世子的長子立於世孫，但朝鮮仁祖卻將昭顯世子之親弟鳳林大君立於了世子。於是，在當代朝鮮社會裡，朝鮮孝宗即位過程是違背嫡長繼承制之事，從而衍生出朝鮮孝宗繼承上的正統性問題（池斗煥，1987：77-125）。更何況由於朝鮮菁英不能接受清朝的正統性，無法從清朝的冊封中彌補朝鮮孝宗在宗法上的缺點。在如此的情況之下，朝鮮孝宗即位之初，高舉復讎雪恥的旗號，大力推動北伐計劃是當然之事。實際上，朝鮮孝宗通過北伐計劃加強武力，以維護政權，而另一方面，起用地方基層士大夫，以獲得國內支持。因爲如此，後代朝鮮國王雖然沒有積極策劃北伐，可是爲了占政治利益一直不願意放下北伐的名分。例如，朝鮮孝宗的嫡長子朝鮮顯宗（第 18 代國王，在位：1659～1674）在發生三藩之亂之際，雖然不願施行北伐，但還要保持北伐的名分；[31] 朝鮮肅宗（第 19 代國王，在位：1674～1720）在三藩之亂尚未平定的情況下即位，斯時在朝鮮朝廷內有趁機發動北伐的主張，[32] 但這種主張未獲得主流政治菁英的重視，直到三藩之亂平定後，朝鮮肅宗向朝臣提及「胡無百年之運」的說法，[33] 以表示自己依然維持北伐名分的姿態。

然而，清朝平定三藩之亂之後，國力日益強盛，穩定支配中原。在如此的情況之下，朝鮮國王即便維持北伐的名分，在現實政治場合上卻逐漸失效。尤其是，在朝鮮國內北伐的名分並不是國王獨占的政治手段。舉出宋時烈（1607～1689）爲例，他在朝鮮孝宗所提出之「北伐」的名分上，

---

31 儒生羅碩佐、趙顯期等，相繼陳疏，大略以爲：吳三桂既據南方，蒙古亦不親附北京，天下事變，迫在目前。乘此機會，鍊兵峙糧，大可以復讎雪恥，小可以安國保民。上慮其煩泄，不賜批答。(《朝鮮顯宗實錄》22 卷，15 年（1674 年）5 月 16 日（己卯））

32 鑵曰：「若生疑而動兵，則正好乘機。我國自有十萬精兵兩西糧餉，亦可易辦，不十日可據瀋陽。瀋陽既擧則關內震動，事無不成之慮。」（中略）鑵曰：「方今外有三事，北伐一也，渡海通鄭二也，與北絕和三也，內則嚴宿衛一事也。凡此數者，若不汲汲圖之，則禍患必至。」(《朝鮮肅宗實錄》2 卷，1 年（1675 年）2 月 9 日（丁酉））。

33 召對玉堂官。上曰：「自古凶奴之入處中華者，皆不能久長，而今此清虜，據中國已過五十年，天理實難推知也。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且神宗皇帝於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拘於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于今，痛恨可勝言哉？」侍讀官姜鋧，典經宋疇錫對曰：「聖敎惻怛，可泣神明，若常存此心而勿失，益盡修攘之道，則國勢自強，而亦有可爲之日矣。」(《朝鮮肅宗實錄》17 卷，12 年（1686 年）11 月 30 日（庚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加了春秋義理來對付清朝的姿態，提出「對明義理論」或「尊周論」。宋時烈強調對明朝「再造之恩」而把明朝和朝鮮君臣關係視爲父子關係，不僅如此，「對明義理論」成爲朝鮮君權的正當性基礎，[34] 因此朝鮮不可忽視「對明義理論」（王元周，2003：39-45）。特別是，隨著朝鮮孝宗以來宋時烈以及他的後學主導政局，其思想也逐漸僵化，並影響到十九世紀末朝鮮地方基層士大夫的對外觀念。

朝鮮肅宗爲了高舉尊周思明的旗號，在明朝滅亡周甲之際的 1704 年，向朝臣表示施行北伐的困難並提出爲明神宗建廟祭祀的方案。[35] 其實，對於朝鮮國王而言，祭祀明朝皇帝是相當有效的戰略。具體而言，在 1704 年 1 月 7 日，權尙夏等朝臣及地方基層士大夫按其師宋時烈的遺命已於華陽洞（位於忠清北道清州）建成「萬東廟」，開始崇祀明神宗萬曆皇帝、明毅宗崇禎皇帝。由而可知，明神宗立廟是可以廣泛獲得當代朝鮮士大夫的方案。在這樣情況之下，朝鮮國王積極興建「大報壇」（俗稱「皇壇」）而祭祀明朝皇帝。到朝鮮英祖（第 21 代國王，在位：1724～1776）將明太祖高皇帝、明毅宗崇禎皇帝列入大報壇祭祀中，而擴展爲三皇併祀。到 1762 年，英祖又加入了徐達、李如松、范景文從祀三帝。朝鮮正祖（第 22 代國王，在位：1776～1800）時，由將英祖修建的供奉明朝遺物的敬奉閣移入大報壇內，更加凸顯大報壇尊周思明的意義。不僅如此，朝鮮正祖將明末時期對抗日本和清朝的朝鮮忠臣列入大報壇祭祀中，甚至下令把這些忠臣的後裔參與祭祀，展現出保存中國文化的中華繼承者之姿態，從而加強國王的

34　時烈曰：（中略）天敍天秩，惟君臣父子爲大，是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彝者也。自古帝王所以正己齊家者在此；所以持綱挈維者在此，苟或捨此，則人類入於禽獸，中國淪於夷狄，可不懼哉？惟我東方，自箕子以來，已爲禮義之邦，而至於勝國，胡風猶未盡變矣。至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文忠公鄭夢周首建大義，辨夷夏陰陽之分，背胡元而事眞主。至於我太祖大王開國，高皇帝視同內服，恩禮周渥；我太祖大王忠貞恪勤，如子事父。至於壬辰之變，受報酬勤，宗社亡而復存，生民死而復生，環東土數千里，一草一木，何莫非帝德之所濡哉？是故，我宣祖大王益罄忠誠，手寫再造藩邦四大字，以寓睿志矣。不幸丙丁之變，國勢萎弱，將相駑劣，至有三田之擧，可勝痛哉？然而仁祖大王誠意深篤，每於皇朝慶節，獨詣後園，痛泣拜跪，二三大臣，亦密伸私義，以受皇朝嘉奬，宗社之至今扶持者，實賴於斯矣。（《朝鮮肅宗實錄》11 卷，7 年（1681 年）1 月 3 日（丁巳））。

35　《朝鮮肅宗實錄》39 卷，30 年（1704 年）1 月 10 日（庚戌）。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權威與君權（孫衛國，2007：99-146；桂勝範，2011）。要而言之，朝鮮國王通過大報壇祭祀，不僅僅是確立繼承明朝的朝鮮正統性，還能與朝鮮中央政治菁英及地方基層士大夫建構了將朝鮮國王作爲最頂端地位的朝鮮式中華體系。

肆、「作為地區霸權的中國」：清朝

滿清入主中原之後，清朝在東亞朝貢體系取代明朝。而清朝雍正帝提出了「華夷一家」的「大中華主義」，他將華夷論的思考框架擴大解釋，並以此當作非漢族皇帝支配中國的正當化基礎。相反的，朝鮮卻縮小華夷論的思考框架，以此表現出了克服朝鮮現實問題的姿態（朴鴻圭，2001：282-285）。在如此的情形之下，清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在表面上長期維持禮節性的往來，但該關係並不像其表面顯示的那麼融洽。

對朝鮮而言，因爲朝鮮將女眞視爲夷狄，所以對清朝降附此事代表著被夷狄恥辱。不僅如此，明朝的軍事援助以助其克服豐臣秀吉的侵攻以後，朝鮮朝廷爲了維持政權以及穩定國內，將明朝如此的軍事援助視爲「再造之恩」，並以明朝的權威做爲朝鮮政權正當化的基礎。在這樣情況之下，朝鮮絕對不能接受以清朝爲中心的秩序而產生了排清意識。因此，明朝滅亡以後的朝鮮在排清意識上又添加了「華夷觀」，因而將清朝看作「夷」，反而自稱自己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即「小中華主義」）。要而言之，朝鮮以「小中華主義」企圖抵消恥辱的現實（鄭玉子，1998）。如此的心態，從明清二代的朝鮮使節所留下的「使行記」名稱變化上也可以窺見。所謂「使行記」，是朝鮮使節在中國見聞、紀行和創作的文獻，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朝鮮使節留下的「使行記」大多稱爲《朝天祿》，這名稱意味著朝鮮使節將明朝是爲「天朝」的意識與心態，但是到了清代，「使行記」則多稱之爲《燕行錄》，意即往來於「燕京」（「北京」此地名的別稱）的記錄。而且他們對於清朝的實際社會情況也沒有甚麼好印象，與對都市和城邑繁盛的感嘆形成鮮明的對照（閔斗基，1980：54-84；崔韶子，1997：191-223）。此外，朝鮮政治菁英對明朝與清朝使用的稱號也大不同，例如朝鮮政治菁英通常使用「中國」、「中朝」、「皇朝」、「皇明」等尊稱稱呼明朝，但對清朝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除了外交公文之外，絕不使用尊稱（桂勝範，2009：39-81）。到了十九世紀後半部，隨著朝鮮接受「以公法爲基礎的條約體制」之過程中，朝鮮偶爾把清朝稱爲中國，但其意只不過是 China 的翻譯，已無尊稱之意。

也就是說，由於朝鮮以程朱理學立國，認同華夷觀與正統論，朝鮮政治菁英無法從以清朝爲中心的朝貢體系中獲得政權的正當性，所以朝鮮朝廷崇祀明朝三皇帝（明太祖高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明毅宗崇禎皇帝）自任爲保存中國文化（即儒教文化）的中華繼承者—「小中華」，以修補朝鮮政權正當性的缺陷。

然而，明朝滅亡後再過 100 年之際，清朝正是進入康乾盛世，因而「胡無百年之運」的說法失去說服力，朝鮮也不能完全忽視這種現實。因爲如此，在朝鮮首都漢陽居住部分朝鮮士大夫認同清朝文物的先進性而提倡學習清朝的文物（即「北學論」）。不過，如此意識形態的變化，很容易造成與以往認知的「小中華意識」衝突。於是，集朝鮮後期儒學大成的丁若鏞（1762～1836），因重新看到「小中華意識」而提出了以「東夷」爲軸心的「小中華主義」，其內容可以看見〈東胡論〉：

> 陸象山曰：「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此儒者之言。雖然風氣所鍾，其氣質之性，有大不同者。北方之人，大抵強悍，故匈奴突厥蒙古之屬，莫不嗜殺戮習殘暴。而西羌，亦詐薄多變。獨夷狄之在東方者，皆仁厚愿謹，有足稱者。拓跋魏，鮮卑也。其入中國也，崇禮樂，獎文學，制作粲然。契丹東胡也。阿保機（原註：遼太祖），敦於天倫，刺葛三叛而三釋之，此虞舜以來，所未有也。其制治之盛，歷年之久（原註：二百餘年），實中國之所堇獲也。女眞，再主中國，而其在金也，虜宋之二帝，而終不加害。將相和附，規模宏遠，非海陵之狂昏，未易亡也。清之得國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貴盈哥（指的是多爾袞）以來，有泰伯仲雍之風者數人，不亦韙哉。史稱東夷，爲仁善，眞有以哉。況朝鮮處正東之地，故其俗好，禮而賤武，寧弱而不暴，君子之邦也。嗟乎，即不能生乎中國，其唯東夷哉。

從上可知，丁若鏞以「東夷」的「仁厚愿謹」之氣質與「仁善」來作爲認同屬於「東夷」的清朝主導秩序的正當化基礎，並肯定朝鮮在諸東夷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中保有地理優越性（即正東之地）的存在價值，也因而表現出了朝鮮文明的優越性（即君子之邦）。但如此一來，似乎即否定了以地理位置（中原）與種族（漢族）作爲華夷區別唯一標準的思考方式。如此脫離現成「華夷觀」的思考方式，在丁若鏞的〈拓跋魏論〉更顯而易見。他否決了以地理位置爲華夷區別的唯一標準思考模式，轉而肯定以道與政爲華夷區別的標準，並進而嚴厲批判現有正統論而認同北魏的正統性。[36]

不僅如此，若把上述丁若鏞的視角擴展到對日本的認識尚且適用。雖然，丁若鏞似乎不把日本看作保有「仁厚愿謹」與「仁善」氣質的「東夷」成員，但他肯定伊藤仁齋（1627～1705）、荻生徂徠（1666～1728）及太宰純（1680～1747）等日本古學派學者的貢獻，並根據當代日本儒學興起，丁若鏞確信日本不再侵略朝鮮。其內容可參〈日本論〉：

> 日本，今無憂也。余讀其所謂古學先生伊藤氏所爲文，及荻先生、太宰純等，所論經義，皆燦然以文。由是知日本，今無憂也。雖其議論，間有迂曲，其文勝則已甚矣。夫夷狄之所以難禦者，以無文也。無文則無禮義廉恥，以愧其奮發鷙悍之心者也，無長慮遠計，以格其貪心婪攫取之欲者也。如虎豹狼，怒則之噬之，饞則啗之，復安有商度可否於其間哉，斯其所以爲難禦也。斯其所以可畏也。

要言之，按照丁若鏞的解釋來說，朝鮮、清朝以及日本曾經歷過「用夏變夷」，因此，丁若鏞的這種視角解釋是把這些國家看作連帶或合作對象的可能性，而十九世紀中半部的朝鮮似乎曾試探其可能性。即，十九世紀初在朝鮮海岸有「夷洋船」出沒以來，朝鮮朝廷對清朝禮府報告情況，

---

36 聖人之法，以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以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與夷狄，在其道與政，不在乎疆域也。（中略）跋其本末，何遽不若牛金之子（原註：東晉實牛氏），一隅偏安，終爲強臣所篡者哉。何不進之爲中國，而必擯斥而不予統也。史家之偏隘如是，故後世自外國而入主中國者，無所勸焉。服胡服，言胡語曰：「汝既不欲中國我，寧我夷狄汝矣。」，率堯舜禹湯之遺民，而夷狄汝矣。其故何也？有慕中國爲中國，如拓跋氏，而史家，猶不肯中國之故也。雖然拓跋氏，自中國矣。彼區區史筆之予奪，何足輕重於我哉。唯魏有二疵焉。方伐宋之時，嬰兒貫槊，而世宗之時，佛法再行，已矣。何國無此疵哉。〈拓跋魏論〉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期刊資料庫

並通過東萊（現在韓國釜山市境內）倭官（擔當對日本關係的行政機關）對日本幕府發出書契，來展現出企圖共同對抗「夷洋船」的姿態。[37] 朝鮮朝廷如此的積極對應態度，乃因朝鮮朝廷的危機意識而造成（朴賢謨，2004 : 7-26）。雖然因未收到日本幕府的回覆，而導致連帶構想失敗的結果，可是朝鮮這般提議，從以中國爲中心的秩序裡的周邊國家所展現的積極對應態度來看，實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對西方勢力挑戰依靠東亞地域秩序來對付的姿態來說，亦具有其不小的意義存在。

伍、十九世紀後半部朝鮮對於「脫中」問題的複雜思維

十九世紀後半部朝鮮對「中國」的認知可分爲三：「作爲地區霸權的中國」（清朝）、「作爲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之中國」（明朝）、以及「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然而，在西勢東漸和日本的興起之下，朝鮮親眼目睹了中日權力轉移的現象，從而衍生出對於「脫中」問題的複雜思維。對於如此的狀況，下面將作進一步且詳細的闡述。

一、清朝對朝鮮的屬國化政策

在十九世紀後半部面臨西勢東漸的危機之下，朝鮮的東亞地域戰略思維爲「韓中日三國共榮論」。依據現有的文獻資料，《漢城周報》是最早期提出這種將韓中日三國視爲共同命運體構想的報章媒體，它所載私議〈論天下時局〉中說：「如果兩國結合，互爲後暖，則即使有百萬歐洲人，也無可乘其隙」。[38] 其構想，大體上是以互相承認各國自主權爲基礎，而從對抗歐美帝國主義的韓中日三國共榮論。以朝鮮朝廷的觀點視之，在以清朝爲中心的朝貢體系框架下可以實現韓中日三國共榮論。因爲這樣，朝鮮朝廷對清朝採取「戰略的事大」政策並企圖維持西方列強跟清朝之間的自主權

37　《朝鮮純祖實錄》32 卷，32 年（1832 年）7 月 21 日（乙丑）;《朝鮮憲宗實錄》12 卷，11 年（1845 年）9 月 15 日（癸酉）。

38　《漢城周報》（漢城），1886 年 3 月 8 日。在此文中所說的「兩國」無疑是清朝中國與日本；原文未見，引自（白永瑞，2000：178 之註解 30）。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鄭容和，2004：95-115）。朝鮮朝廷的這種戰略，在清朝也要在現有的朝貢體系框架內保持與朝鮮維持關係的情況下才能成功。

的確，從 1870 年代清朝與朝鮮的關係來看，朝鮮的這種對外戰略基本上似乎已經成功。即，1876 年朝鮮與日本簽訂《朝日守護條規》後，清朝爲了牽制日本和俄羅斯進入韓半島，採取了干預朝鮮外交政策的戰略，但並沒有打破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但進入 1880 年代後，俄羅斯、英國及法國等西方列強及日本開始露骨地表現出對中國和韓半島的勢力擴張意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以 1882 年壬午軍亂爲契機，清朝對朝鮮推行屬國化政策（金顯哲，2016）。例如，在朝鮮發生任午軍亂（1882 年）時，帶清軍進入漢城的馬建忠綁架了（朝鮮高宗的生父）興宣大院君，並解送天津（權錫奉，1986：211-245）。此事件破壞了傳統朝貢關係上的內政不干涉原則。清軍進入朝鮮以後，朝鮮的財政與海關以及外交部分決定權被清朝控制，在這樣情況下，1882 年清朝與朝鮮締結了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的《朝清水陸商民貿易章程》（以下簡稱「章程」），而其並非屬於平等國家間締結的條約。基本上清朝在此章程中對朝鮮闡明了清朝的宗主地位，並包括對朝鮮有關經濟的、戰略的、外交的特權條款。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章程》的特權條款內容和西方列強的特權條款內容差別甚微（金正起，1988：111-112）。因而有些韓國學者將如此的清朝行爲看作「亞流帝國主義」（金基赫，1996：48）或「正統帝國主義」（柳長根，2004：49）。

到 1884 年中法戰爭劇烈時期，清朝撤回了駐紮在朝鮮的兵力的一半，削弱了對朝鮮的控制。斯時，激進開化派在日本的支持下發動甲申政變，試圖建立親日政權，但政變第三日，就被袁世凱指揮的清軍擊退。從此以後，清朝更加強化對朝鮮的影響力。對此，朝鮮高宗在 1884 年至 1885 年間，爲了牽制清朝的一環，與俄羅斯進行秘密接觸，試圖朝鮮中立化。然而，袁世凱阻止朝鮮的此舉，而他在 1888 年〈朝鮮大局論〉上提出：「朝鮮本屬中國」的對韓半島認識，並主張「無朝鮮，是無東壁，王者不得已而用兵。故緬甸可容，越南可緩，而朝鮮斷不可失。韓如背華，華必飛師迅至，據而有之，以爲上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2160-2163）。

在如此的情形之下，甲午戰爭結束之後，朝鮮朝廷毫無猶豫地拋棄朝貢體系框架並對外表示自主獨立的地位。然而，朝鮮即便對外展現出主權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國家的姿態，但對內仍然代表保存中國文化（即「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的中華繼承者姿態。也就是說，甲午戰爭結束後，朝鮮雖然「脫離清朝的朝貢體系」，但卻脫離不了「中國」。對於如此的狀況，下面將作進一步且詳細的闡述。

二、明朝的遺產與大韓帝國的成立

由於清朝對朝鮮採取帝國主義政策，甲午戰爭結束後，朝鮮毫無猶豫地脫離清朝的朝貢體系，而對外展現出主權國家的姿態。但是，從改「朝鮮」國號爲「大韓帝國」的過程中，還費時兩年多的時間。首先，在 1896 年 1 月，朝鮮採用西曆，同時改元建陽，進而將國王稱號改爲大君主，王妃爲王后，王世子爲王太子。同年 11 月 20 日，原本迎接中國使節的迎恩門，在朝鮮朝廷的支持下，被由開化派組成的獨立協會拆除，並在原址建立獨立門。這些舉動闡明朝鮮「脫離清朝的朝貢體系」的姿態。

然而，稱帝問題在朝鮮引起爭議（李玟源，1988：261-296）。稱帝之議最早起於 1895 年 10 月間，當時日本及朝鮮朝廷內親日勢力，爲了掩蓋日本人殺害朝鮮王妃（後來追封明成皇后）的事件（乙未事變），才主張稱帝，但後來沒有實行。到 1897 年 5 月，朝鮮朝廷在不受日本的控制之下，再次進行稱帝之議。斯時主導稱帝之議階層爲居住漢城的基層士大夫，我們從他們的提議中可以發現贊成稱帝的三項邏輯：第一，將稱帝視爲自主獨立國家的權利；[39] 第二，通過稱帝向他國闡明自主獨立國家的姿態；[40] 第

---

[39] 前承旨李寀榮等疏略：（中略）以陛下之盛德弘業，值今日自主獨立。以詔以勅，既行皇帝之制，而尚居君主之位。君主與皇帝，方今天下通行之例，而其揆則一也，以若本國臣民之膠見咸願，莫如稱帝也。（《朝鮮高宗實錄》35 卷，34 年（1897 年）5 月 1 日）；幼學權達燮等疏略：……建陽元皇家之號，堂簾有級。凡在臣民苦心衷懇，咸願聖意之轉回也。竊伏惟陛下時雍之治，文明之德，可質於神人，而今於自立之位，詔勅命令，建元月日，已行皇家之制。而尚居君主之位，君主與皇帝，方今一世觀之，則其義一也，以若本國臣民之管測膠見，莫如乎稱帝也。蓋自主『自』字，獨立『獨』字之義，專在於自意獨擅，不在於諮此依彼也。（《朝鮮高宗實錄》35 卷，34 年（1897 年）5 月 9 日）

[40] 幼學姜懋馨疏略：「今泰西各國曰『皇帝』，曰『大君主』。曰『大伯理』之稱，雖曰無等第於其間，惟亞細亞東洋一局，歷代帝王之別，果有高下之殊。（中略）伏願陛下，特副萬黎之望，亟進大寶之位，以繫邦命，以鎮眾志焉。」（《朝鮮高宗實錄》35 卷，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三，將朝鮮視爲保存中國文化的中華繼承者，從這種小中華意識出發，主張朝鮮具有稱帝資格的文明國。[41]

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前兩項贊同稱帝的邏輯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當時激進開化論者發行的《獨立新聞》對於朝鮮高宗（第 26 代國王，在位：1863～1907）的稱帝一事，如此寫道：「數百年來，朝鮮人只視清國皇帝爲唯一皇帝予以尊奉，然而此時朝鮮的忠臣們開始認爲朝鮮大君主陛下實乃與清國皇帝地位同等，這的確是朝鮮已經得到自主獨立的表徵」。[42]

至於贊同稱帝的第三項邏輯，我們必須先了解時代背景。即，1880、90 年代朝鮮經由日本思想文化界的媒介，受到「文明論」影響。根據文明論的邏輯而言，文明開化程度將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被加以縱向排列，從而形成差別的階序格局。因此，從西方文明論框架來看，歐美爲「文明／先進」，東亞則爲「文明／後進」。然而，上述的第三項稱帝的邏輯，將中華傳統文明和西方近代文明劃等號，從而主張保存中華文明的朝鮮能與近代西方文明國並肩而立。

直到 1897 年 9 月以後，時任議政府議政（相當於國務總理）沈舜澤[43]

---

34 年（1897 年）5 月 26 日）。

41 議官任商準疏略：「惟我東邦，自箕聖以後，禮樂文物，典章法度，燦然具備，掎歟盛哉！（中略）咸出我聖上功德，而以是之功之德，未進帝號，亶出於巽謙而未遑矣。今天下友邦咸服我聖上功德，聘弊相繼，梯航竝臻。是天下友邦之所以尊我聖上而自主獨立。」（《朝鮮高宗實錄》35 卷，34 年（1897 年）5 月 16 日）；幼學姜懋馨疏略：「（中略）我邦雖疆域不大，羲、黃以來，五千餘年正統相傳之禮樂文物，亶在於是。（中略）伏願陛下，特副萬黎之望，亟進大寶之位，以繫邦命，以鎮眾志焉。」（《朝鮮高宗實錄》35 卷，34 年（1897 年）5 月 26 日）。

42 《獨立新聞》（漢城），1897 年 10 月 2 日。

43 舜澤曰：「帝王之稱，有不同者。以其功業之不同，而制度文章，截然不同。夫帝業者，大一統之謂也。一統者，自古帝王禮樂政教，有以承之，有以傳之也。有是業，則必得其位，有其位，則必得其名。……惟我邦，自檀、箕以來，服襲堯、舜，至于本朝，炳焉與三代同風。……惟我陛下挺上聖之姿，啓必興之運，舊邦重恢，天命維新。……建獨立之基，行自主之權。漢、唐、宋、明典憲規模，金石在府，使萬國取法焉。天下文明在我，而帝皇之統，實在於我矣。天之所命，人之所歸，時則然矣，禮則然矣。……各國約章，有各國帝號認之之說。此謂國小兵弱，不足與方駕者及俚俗醜陋不能進步於開明者，則各國未必認之而通行也。惟我幅圓四千里，堂堂萬乘之國，可以養百萬之眾，禮樂文物，表準於天下。」（《朝鮮高宗實錄》35 卷，34 年（1897 年）9 月 30 日）。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和宮內府特進官（相當於總統府秘書長）趙秉世[44] 等朝鮮朝廷高官主導稱帝之議。[45] 不過，他們所指出的稱帝邏輯不僅僅單純地強調小中華意識，還將保存中國文化的中華繼承者角色作爲繼承明朝皇統的根據。此時，朝鮮朝廷爲了將圜丘壇的設立和祭天儀式的舉行合理化，以 1704 年以來朝鮮國王崇祀明朝三皇帝之事（大報壇祭祀）爲根據，指出朝鮮爲明朝皇統的繼承者的說法。尤其是，當代朝鮮人將大報壇與圜丘壇皆稱「皇壇」，卻沒有詳細區分，從而衍生出設立圜丘壇的邏輯（桂勝範，2011：221-249）。例如，明朝遺民後裔六品官員片相薰上疏：「我邦衣冠文物典章制度，悉遵皇明遺制，燦然具備。而設壇追享，闡大義於天下，玆豈非溯其源而接其統者乎？」，[46] 大力支持大韓帝國繼承明朝皇統的說法。於是，在 1897 年

44　秉世曰：「……自古受命之君，必得其位號。位者，大寶也。號者，曰皇曰帝是也。此天所以授之也，非有以人力而致之也。陛下巍勳洪烈，邁於古先，必有位號。……且國家禮樂法度，損益乎漢、唐、宋、明。今環瀛以內，祖述堯、舜，而承其統，惟我邦爲然。夫承其統，則必定其名位。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位未定，不足以承其統而行其事矣。自昔聖哲，有不得以揖讓而退遜。……而夫帝統者，以傳其禮樂法度也。自三代以後，守其禮樂法度，至于今日，而文明之化垂于萬世者，實惟我邦也。帝統在我，曆數在我，而適當一元開泰之會。苟不有眞定大號，不足以明接其傳而承其統矣。伏願陛下勉回沖謙，俯循輿情，以重帝統，以承天位焉。臣等不勝激切顒祝之矣。」（《朝鮮高宗實錄》35 卷，34 年（1897 年）9 月 30 日）。

45　1897 年 9 月 30 日以後的相關內容，參見《朝鮮高宗實錄》35 卷，34 年（1897 年）10 月 1 日至 3 日。

46　其全文如下：六品片相薰疏略：「臣竊惟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聖，膺無上至尊之號。乃於大臣庭請之日，俯循仰察，俞音繼降，典禮克定。凡在陛下臣民者，孰不擎誦攢祝，獲覩今日之誕擧也？伏念臣以皇朝遺裔，夙抱尊周之大義，深感正統之靡定，而皇風不振，只激志士之憤，燕雲相接，徒切一國之慟，于玆二百有餘年。何圖今日進大號而即寶位？應行節目，復覩皇明舊制，其所欣感慶忭之心，惟均。嗚呼，至哉！臣敢以大一統之義，仰陳之。堯之所以傳舜，舜之所以傳禹，禹之所以傳湯，湯之所以傳于文、武，以及於漢、唐、宋、明，莫不尊其號而正其統。尊其號者，即三皇五帝之合以稱之是也。正其統者，即唐承漢統，明承宋統是也。故正統尊號，自漢以來相承之大典，無可容措於其間。猗！我邦衣冠文物典章制度，悉遵皇明遺制，燦然具備。而設壇追享，闡大義於天下，玆豈非溯其源而接其統者乎？祖宗朝聖繼神承，重熙累洽，式至于今。使之對揚天心、標準斯民，亦不越乎此矣。今我陛下洪功盛烈，卓冠古今，承神明之佑，恢中興之基，梯航交聘，萬國同列，實天命人心將有待於今日也。伏願陛下順天人之義，即帝位之日，望拜北苑，受禪明統，誕敷文德，克光前烈。則列聖在天之靈，亦當陰騭默佑於冥冥之中。而寔天眷宥密景命迓續之會耳。伏乞聖明

臺灣大學韓國研究中心資料庫

10 月 12 日，朝鮮高宗依據《大明集禮》和《大明會典》的圖式在圜丘壇舉行祭天儀式並登基爲皇帝，以展現出繼承中華文明與明朝皇統的姿態（桂勝範，2011：241）。同時，宣布改「朝鮮」國號爲「大韓帝國」，改元光武，並推動以「舊本新參」爲理念的光武改革。

從上可知，甲午戰爭結束後，朝鮮稱帝改元，表示脫離清朝獨立。在此環節上，當時朝鮮各界毫無猶豫之處，但在「脫離中國」問題上仍有分歧。第一，激進開化派主張全面脫離「中國」，我們可以從他們發行的《獨立新聞》得知詳細的相關主張。第二，穩健開化派依然維持「小中華意識」的歷史經驗，從而謀求朝鮮的近代化，我們可以從他們發行的《皇城新聞》得知詳細的相關主張。第三，大韓帝國的政治菁英依然維持小中華意識與明朝權威，稱帝改元，顯示自任爲中華正統的姿態。也就是說，甲午戰爭結束後，朝鮮十分乾脆地「脫離清朝」，但卻脫離不了「中國」，並由此產生朝鮮對於中日權力轉移的複雜思維。對於如此的狀況，下面將作進一步且詳細的闡述。

三、大韓帝國的三國共榮論

1897 年，與變法論者有交流的宋恕〈《朝鮮大事記》自序〉一書中寫道（1993：282-283）：

> 昔我叔祖箕子遭受喪師，不愿臣姬，乃王朝鮮。學者多言朝鮮由是始爲文明之域，或言唐虞時已開化，世莫能上詳。要之，萌芽姚前，華實姬代，誠亞細亞洲一古國歟！……嗚呼！昔者朝鮮之學源出震旦（指的中國），日本之學源出朝鮮，今乃朝慚日、震慚朝，感不絕於余心，獨愴然而涕下！天王未欲興儒拯黃（指的是黃人種），其庶震旦、朝、日相師相愛以免奴於歐羅巴歟！嗚呼！其或有時也哉！其哉有時也哉！

仔細玩味上舉宋恕的這一段話，反映了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中國社會的實況，毋寧更透露了當時中國知識階層亟欲動員將韓中日三國視爲共同命

俯垂鑑諒，正大統合尊號，亟臻受禪之儀。則非但臣一人之言，其將永有辭於天下萬國矣。臣迹本疎遬，參在縉紳之末，猥敢仰瀆，勿以臣人微而廢棄焉。」批曰：「惟爾宜有此言也。」（《朝鮮高宗實錄》36 卷，34 年（1897 年）10 月 10 日）。

臺灣人文社會知識庫

運體的意識形態以及其所蘊含的特定價值，以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威脅的迫切意圖。

此時，韓國社會廣泛地認爲韓中日三國應該同心協力對抗西方帝國主義，但在中日權力轉移之際，清朝中國不再是韓中日三國的領導。即，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韓國高度關注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興起，並且依據進化論的文明觀念而重新看到中國與日本，因而韓國社會內中國地位急轉直下（李完宰，1989：145-177），[47] 反而將日本視爲是與西方相提並論的文明國家。[48]

激進開化派在韓國社會主導這種新潮流。他們從小接受程朱理學的教育，但在 1880、90 年代，經由日本思想文化界的媒介，受到「文明論」影響。尤其是甲午戰爭以後，激進開化派高度關注日本的勝利和清軍敗北的原因，從此開始質疑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地域秩序，甚至非常露骨的顯示出蔑視中國的論述態度。例如，激進開化派發行的《獨立新聞》，在發行刊物中如此批判中國文化的有害性，其部分內容如下：

> 所謂漢文書籍，大部分是清國所出版的書籍，已經經過數百年，雖然這些書籍在當時對清國百姓有益，但其學問現在則不僅對朝鮮人民來說有害無益，而且對清國人民來說也是貽害無窮，看看今天的清國就可以明白了。[49]

47　另外，研究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韓國民族主義的金珉煥，以《漢城旬報》（發行期間：1883～1884）、《獨立新聞》（發行期間：1896～1899）、《皇城新聞》（發行期間：1898～1910）、《大韓每日申報》（發行期間：1904～1910）等報刊社論爲研究對象，針對社論中對主要強國的態度做了計量分析。將這些分析的要點概括起來，當時這些報紙對中國大體上持否定態度，這主要是受到中國國力衰退和不積極文明開化的影響。即，甲午戰爭之前發行的官報《漢城旬報》對中國多少還持正向看法，然而，甲午戰爭之後所發行的《獨立新聞》和《皇城新聞》則表明更加強烈的否定傾向，後來在俄日戰爭中獲勝的日本，企圖對韓國進行保護國化的情況下發行的《大韓每日申報》，雖然對中國的關注程度大大降低，但是卻相對持有比較均衡的態度（1988：375-412）。

48　將日本視爲是與西方相提並論的文明國家之韓國言論的報導，參見《獨立新聞》（漢城），1897 年 12 月 6 日；《獨立新聞》（漢城），1899 年 1 月 17 日；《皇城新聞》（漢城），1899 年 2 月 17 日；《皇城新聞》（漢城），1906 年 9 月 27 日。

49　《獨立新聞》（漢城），1896 年 4 月 25 日。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此觀之，《獨立新聞》的激進開化派並沒有把清朝與「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之間劃清界線，反而將清朝（以及中國文化）視爲阻礙韓國文明開化之傳統象徵。以上述的文章登刊的時間點來看，明顯是針對中國在甲午戰爭被日本打敗的事情而提出的。進一步，《獨立新聞》正面質疑華夷觀念，並將開放港口以前的韓國比喻成「井底之蛙」，悲嘆地訴說：

> 大韓雄據在偏蔽的東海，數千年閉關鎖國。因此，韓國不僅僅因爲不知世界情勢，而不知文明國如何運用法律，才會只知道仰望中國與蔑視倭國，甚至把其他諸國家稱爲夷狄。然而，開放港口十餘年以來，我們可以迎接來自世界各國的來賓，此時才得知西洋各國習俗如何。從此可以推見，哪國是文明國，哪國是野蠻。[50]

從上可知，激進開化派將西方文明視爲標竿，開始從世界各國中判別出文明國和野蠻國。接著，《獨立新聞》將日本對中國獲勝的主要原因，視爲日本文明開化的成功，並把日本稱爲具有與西方同樣的「文明」氣質之「文明國」成員。從這樣觀點出發，中國傳統文明也徹底被視爲毫無用處的東西而加以排斥，[51] 並加以提倡（脫離中國的）自主的學問。[52]

然而，許多研究成果顯示，在韓國社會之所以產生這種蔑視中國觀念的原因，不只有社會進化論的因素，其中亦含有政治、經濟的因素。1882 年簽訂《朝清水陸商民貿易章程》的結果，中國商人可以自由在漢城、仁川、釜山以及元山這些以開放港口爲中心來進行居住和從事貿易行爲，可是中國行商卻踰矩許可範圍而深入內地商圈，形成「貿易網」，並與韓國人之間產生矛盾糾紛（孫禎睦，1982：186-190）。然而，此問題一直拖延到 1899 年締結《韓清通商條約》才終於獲得解決。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商人和其無賴的行動造成了日常生活中韓國人對中國人的負面感受，因而引起韓國人的反清意識（金正起，1993：31-68）。對此，當時擔任《獨立新聞》主編的徐載弼，把中國商人叫做「吸朝鮮人血的人」，因爲「近年清人開始進入朝鮮，搶走了朝鮮人的工作和生意，使本來骯髒的街道變得更髒，誘

50 《獨立新聞》（漢城），1899 年 6 月 5 日。
51 《獨立新聞》（漢城），1896 年 12 月 12 日；《獨立新聞》（漢城），1898 年 4 月 12 日。
52 《獨立新聞》（漢城），1898 年 1 月 28 日；《獨立新聞》（漢城），1898 年 3 月 8 日。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使朝鮮人吸食鴉片」，不僅如此，徐載弼將中國商人比喻成「吸血鬼」，用憤慨地語氣說：「清人只爲了自己剩下利潤，完全不會對有關文明開化的產業投資！」，因此徐載弼的結論很明確，就是「我們不願意這種清人進入朝鮮！」。[53]

有趣的是，在西方和中國對比之下，如此將中國視爲野蠻的說法，對激進開化派很有吸引力，進而使韓國似乎表現出以中國和西方之間作爲中間者的角色——「半開化」。這種「半開化」的角色引起兩種反應：首先，以韓國對中國佔有文明上的優勢作爲理由，強化韓國具有獨立地位的正當性；其次，以將來達成文明開化爲前提，企圖使帝國主義正當化。例如，中國在甲午戰爭後，由於三國干涉處於被瓜分的境地，朝鮮在實現了文明化後曾堅決地希望能夠參與瓜分，「朝鮮亦能打敗清國，占領遼東和滿州，得八億元賠償金，但願朝鮮人下定決心，十年後占領遼東及滿州」。[54] 要言之，在《獨立新聞》中顯示出的蔑視中國的論調，是建立在已經適應帝國主義秩序的社會進化論基礎上，可以說僅僅是給「適應而生存者」的「適者」（the fittest）賦予了最強者（the strongest）和最優者（the best）的倫理脈絡的內涵。

在如此的情況之下，激進開化派所指出的「黃種三國共榮體制」的構想中，關於日本的角色激速提高，相對於中國的角色反而呈現相當的衰退。比如，《獨立新聞》認同韓中日東亞三國之間的關聯性，便說：「韓日清三國人同住在亞洲，因爲同屬黃人種，所以（三國人的）身體和毛髮極爲近似。使用同文，甚至擁有多數的共同的文化習俗」，[55] 可是在文明論上又添加了對抗白色人種的人種論，並依此出發來重新看到日本，提倡以日本爲東亞盟主的亞洲連帶論。於是說：「今天的日本是走在黃色人種的前列之（文明的）萌芽，對內政治法律修明，對外是抵禦強盜的長城」，[56] 因此展望日本「在東洋諸國中可以爲盟主」，[57] 期待日本「早定大計，保護這一（文明

53　《獨立新聞》（漢城），1896 年 5 月 21 日。
54　《獨立新聞》（漢城），1896 年 8 月 4 日。
55　《獨立新聞》（漢城），1898 年 4 月 7 日。
56　《獨立新聞》（漢城），1899 年 11 月 9 日。
57　《獨立新聞》（漢城），1899 年 6 月 19 日。

臺灣人學與漢籍期刊資料庫

的）種子，維持東洋大局之和平」。[58] 由此可見，在《獨立新聞》的亞洲連帶論中，中國的角色顯然相當薄弱。

然而，《皇城新聞》與《獨立新聞》相比，還略微有關注到中國改革的可能性，所以提出了韓中日作爲共同命運的「三國共榮體」，此理論大體上是在各國自主權基礎上聯合起來共同對抗白色人種的黃色人種共榮論。因此，《皇城新聞》對中國的論調，與《獨立新聞》相比，可說對中國內部改革的可能性所抱持的強烈同情心。[59] 不僅如此，代表穩健開化派的《皇城新聞》在西方文明和東洋文明的價值觀之間儘量保持中立，在「小中華意識」的歷史經驗上添加了「文明論」，從而指出「東洋」概念。即，《獨立新聞》所指出的「半開化」角色，至於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擴張主義卻行不通，因爲以文明開化的觀點來看，韓國是個還比他們落後的國家，因而加強西方和日本對韓國殖民化的正當性。在這樣情況之下，《皇城新聞》的東洋論者爲了消除與先進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產生的危機感，以及表現對實現文明開化的自信，作爲整體性的一環而創作了「東洋」的概念。然而，這一概念指的並不是像日本知識界所提出那樣「地理上與日本位於同一地域但文明上較爲落後的地區」，而是包括韓中日三國的儒教文化圈。這種思路在東亞社會盛行亞洲主義論述時，可以讓韓國在中日兩大國之間表現出獨立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皇城新聞》經常將這些過去東洋開化思想家所施行的「文明開化」與西方的「文明開化」劃上等號。比如，《皇城新聞》即主張西方文明國的統治體制基本上與堯舜三代差別甚微。[60] 在如此的論調之下，發行初期的《皇城新聞》，爲了讓讀者（大部分是儒教知識階層）容易理解「文明開化」的概念，引用中國經典的故事來說明其概念，甚至在這

58 《獨立新聞》（漢城），1899 年 3 月 5 日。

59 萬一當年與日本一樣遵行新法，其間 30 年，何事不成？即使是雄健猛戾的英法俄諸國也必然畏伏清國的威力，怎會在日本面前連戰連敗，遭受羞恥？可是雖然清國行西法有百利而無一弊，清國卻事事不然（《皇城新聞》（漢城），1898 年 9 月 17 日）。

60 嗚呼！堯舜三代致治之道，誠不外乎信，今列強做治之術，其本文，亦不外乎信而已矣。治本，豈有二道乎哉！（《皇城新聞》（漢城），1903 年 4 月 3 日）。與此類似的社論，可參《皇城新聞》（漢城），1898 年 10 月 27 日；《皇城新聞》（漢城），1902 年 7 月 17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樣過程中擁護改革的儒教面貌。以伏曦、神農、唐堯、虞舜以及孔子的故事爲例，強調他們都是過去東洋的開化思想家。[61] 進而，以十五世紀發明韓文的朝鮮世宗和十六世紀發明「龜船」對抗日本侵略的海軍提督李舜臣爲例，強調過去韓國開化思想家的業績。[62] 甚至，在批判國內反改革的保守儒教知識分子時，依然承認「在過去韓國也存在（以儒教爲基礎的）優良的制度和作風」。[63]

在如此的觀點之下，穩健開化派所指出的「黃種三國共榮體制」的構想中，雖然高度評價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可是在韓中日作爲共同命運體構想的同時，亦顯現出絕不應忽略中國在東亞地域安全保障上尙處重要角色的看法，因而把東亞描述成「四萬萬中國人、兩千萬韓國人以及四千萬日本人同住，而且（三國人）作爲同種，享受同文的地區」。[64] 於是，以「現今，東洋三國，互相顧恤，互相保護，乃可存全一局，稍有知覺，所共確信者」爲立場，指出：「向日，日本以目前之利，以失東洋大局之權，此吾所長嘆者也」。[65] 再者，《皇城新聞》非常嚴厲地批判只關心自國安全卻不關心東洋鄰國安全的日本態度，[66] 再度強調中國瓜分危機：「現今必須扶回東洋之勢才能並立於世界者，一則清國，二則清國，若清國瓜分之日，雖日本之十倍強力，尙難之保」。[67] 由此可見，《皇城新聞》的東洋主義者對中國還持有十分確信的態度，與此相反的，其對日本往往表現出曖昧游移的猶豫態度。其實，以人種主義的觀點看來，日本是屬於東洋的黃種民族，但從文明論的角度來看，日本是與西方列強對等的國家，而且有時候日本對東洋諸國的行爲與西方列強差別甚微。在這樣情況之下，《皇城新聞》希望日本對東洋諸國發揮領導力：

61　《皇城新聞》（漢城），1898 年 9 月 23 日。
62　《皇城新聞》（漢城），1899 年 4 月 28 日。
63　《皇城新聞》（漢城），1899 年 6 月 28 日。
64　《獨立新聞》（漢城），1899 年 5 月 24 日。
65　《皇城新聞》（漢城），1898 年 12 月 24 日。
66　《獨立新聞》（漢城），1899 年 5 月 17 日。
67　《獨立新聞》（漢城），1899 年 6 月 13 日。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 因爲天運欲復東洋微勢，幸虧日本最先文明開化，以一小島國不受列強控制，兀然立於東洋一隅。所以，萬一日本自驕此稍勝之力，對待韓清兩國不善或對韓清兩國普及文明開化感到厭倦，火勢延燒到自己家時，極難單獨急救，因此日本該深思脣亡齒寒之道。[68]

尤其在因俄國擴張而感到不安的 1903 年，在《皇城新聞》〈閱韓日清三國地圖有感〉的社論中，回顧韓中日三國之間長久糾紛的歷史，而號召韓中日三國要併力合心。[69] 直到俄日戰爭劇烈時期，《皇城新聞》不但將日本視爲東洋的守護神，更甚而將日本的勝利與東洋、黃種、國家的安全保障劃上等號，其如此評論道：「萬一俄國獲勝，而日本打敗，東洋將來被（西方列強）瓜分，黃人種命運，尙難之保」。[70] 要言之，《皇城新聞》的穩健開化派並把清朝與「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之間劃清界線，而將「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作爲具有普遍性意識的文明——「東洋」文明。這種視角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把韓國、中國和日本通過「東洋」的地域性框架統一爲一個整體；另一方面，高度關注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文明開化，展開了以日本爲東洋盟主，並試圖以此克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論調。這種包括黃人種連帶意識的論述，對當時的韓國人很有吸引力。所以，1904 年俄日戰爭爆發後，在韓國社會出現了支援日本的舉動（李光麟，1998：294-295）。

大韓帝國的外交政策基於這種《皇城新聞》的東洋論述，因而在 1899 年，俄羅斯策劃逼迫韓國把咸鏡道租給俄羅斯的傳聞傳出時，大韓帝國高宗皇帝將此視爲擾亂東洋和平的行爲，請求日本公使予以協助，並試圖對三國的相互聯繫予以應對。[71] 然而，俄日戰爭之後，對於從俄日戰爭中奪

---

68 《皇城新聞》（漢城），1899 年 4 月 12 日。

69 《皇城新聞》（漢城），1903 年 8 月 12 日。

70 《皇城新聞》（漢城），1904 年 2 月 12 日。

71 無論與歐美國家的交往多麼親密，但從根本上看，由於人種和宗教信仰不同，當與任何一國產生釁隙時，在人種、宗教的關係下做出決定是自然而然的趨勢，怎能不去深究呢？即使國家弱小，只要互相合作就能對抗強大國，反之，作爲弱小國家各自孤立無援時，其勢力更加脆弱，最終逃脫不了被強國併吞。凡屬東方國家，唯一能保持獨立的是日本、清國、韓國三個國家。因爲日本其中是最強國，所以如果以日本爲盟主，與清韓合作，就可以充分預防列強的侵略。既然如此，現在的當務之急，則是三國各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得勝利的日本來說，東亞三國的共榮遠遠不如將韓國納爲保護更有吸引力，而這樣的看法使得亞洲連帶論走入了歧路。其一，放棄把亞洲看作一個單位的勢力均衡論而改向追求民族主義。[72] 另一種方式則是利用促使反覆強調東洋共榮的本意，以達到使日本人覺醒其破壞東洋和平的意圖。用實際行動力來顯示這條路的正是 1909 年擊斃了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他被日本逮捕之後，在旅順監獄裡寫下《東洋和平論》一文（韓譯：《東洋平和論》）。在此文中，我們可以知道他擊斃伊藤博文的原因：安重根基本上推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並將俄日戰爭看作黃白二種的戰爭。日本天皇還開展布告中宜言要「維持東洋和平，堅固韓國獨立」，韓國與清國兩國人民都曾予以支援。然而，日本卻不信守諾言，不僅將朝鮮納爲殖民地，還要將中國納爲殖民地，這是破壞東洋和平的行爲，而導致結果如此的犯人不是別人，正是伊藤博文，所以安重根從國際法所保障（獨立）戰爭的層次上將其刺殺，藉以警告破壞東洋和平的日本人。

陸、結論

十九世紀後半部朝鮮代韓國對「中國」的認識可分爲三：「作爲地區霸權的中國」（清朝）、「作爲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之中國」（明朝）、以及「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小中華意識）。在面臨西勢東漸的危機之下，朝鮮朝廷對清朝採取「戰略的事大」政策並企圖維持西方列強跟清朝之間的自主權。然而，清朝破壞了傳統朝貢關係上的內政不干涉原則，卻對朝鮮採取屬國化政策。因爲這樣，甲午戰爭結束之後，朝鮮稱帝改元，表示脫離清朝獨立。當時朝鮮各界對此政策毫無猶豫之處，反而在「脫離中國」問題上仍有分歧。

首先，激進開化派依據進化論的文明觀念，正面質疑華夷觀念，並沒有把清朝與「作爲文化體系的中國」之間劃清界線，並將清朝（以及中國

自維持和平，謀求和平與和諧（外務省，1955：942-943）。

72 況國家爲主，東洋爲客。然而，今日東洋主義提倡者，卻國家爲客，東洋爲主。……韓國永亡，韓族永滅，但此國土歸黃種所有則樂觀其變，豈可如此？嗚呼，不可！（《皇城新聞》（漢城），1909 年 8 月 8 日）。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化）視爲阻礙韓國文明開化之傳統象徵，從而主張全面脫離「中國」。

其次，穩健開化派在西方文明和東洋文明的價值觀之間儘量保持中立，在「小中華意識」的歷史經驗上添加了「文明論」，從而指出「東洋」概念。這種思路在東亞社會盛行亞洲主義論述時，可以讓韓國在中日兩大國之間表現出獨立空間。這種視角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把韓國、中國和日本通過「東洋」的地域性框架統一爲一個整體；另一方面，高度關注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文明開化，展開了以日本爲東洋盟主，並試圖以此克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論調。

綜合而言，甲午戰爭結束後，韓國雖然對外展現出主權國家的姿態，但以小中華傳統思維爲基礎的韓國內部菁英勢力和社會秩序依然穩固，從而衍生出對於中日權力轉移的複雜思維。也就是說，韓國即便加入以主權國家爲主的國際體系，但國內菁英依然根據本國的過去經驗，將西方帝國主義列強視爲比日本更具有威脅本國安全的強勁對手，因此提倡三國的相互聯繫予以應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東亞三國共榮論，以期盼能重現過去的東洋文明繁榮的景象。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72. *Qingji zhong ri han guanxi shiliao 4*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Korea (1864-1911) Vol. 4*].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宋　恕，1993，《宋恕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Song, Shu. 1993. *Song Shu ji I* [*The Works of Song Shu 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孫衛國，2007，《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思想問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Sun, Wei-guo. 2007. *Da Ming qihao yu xiao Zhonghua yishi : Chaoxian wangchao zun Zhou si Ming wenti yan jiu, 1637-1800* [*The Banner of the Great Ming and the Mini-Middle Kingdom Worldview: Research on the Topic of the Chosŏn Kingdom's Respect for the Zhou and Commemoration of the Ming, 1637-1800*].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臺灣人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嚴從簡，1993，《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Yan, Cong-jian. 1993. *Shu yu zhou zi lu* [*Ming Dynasty Record (1574) of Exploration and Foreign Relatio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日文部分

古田博司，1998，〈東アジア中華思想共有圏の形成〉，駒井洋（編），《脫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しての社会知—社会科学の非西欧的パラダイムの可能性》，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頁 39-85。

外務省，1955，《日本外交文書 (32)》，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

濱下武志，1997，《朝貢システ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

三、韓文部分

桂勝範（계승범），2007，〈광해군대　말엽(1621-1622)　외교노선　논쟁의　실제와　그　성격〉，《역사학보》，193:　1-37。Kye, Seung-bum. 2007. “Kwanghaegun malyeop (1621~1622) oegyo noseon nonjaeng ui silje wa geu seonggyeok” [The Nature of Court Debate over Foreign Policy in the Last Phase of King Kwanghae’s Reign in Chosŏn Korea, 1621~1622]. *The Korean Historical Review* 193: 1-37.

桂勝範（계승범），2008，〈계해정변(인조반정)의　명분과　그　인식의　변화〉，《남명학　연구》，26: 439-478。Kye, Seung-bum. 2008. “Gyehae jeongbyeon (Injo Banjeong) ui myungbun gwa geu insik ui byunhwa” [The Causes for the Coup of 1623 and Their Adjustment in Choson Korea]. *The Nammyonghak Study* 26: 439-478.

桂勝範（계승범），2009，〈조선후기　중화론의　이면과　유산:　명·청　관련　호칭의　변화를　중심으로〉，《한국사학사학보》，19:　39-81。Kye, Seung-bum. 2009. “Joseon hugi Junghwa ron ui imyeon gwa yoosan” [Korean Elites’ Consciousness of Little China under the Qing Dominance and Its Legacy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Modern Era].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19: 39-81.

桂勝範（계승범），2011，《정지된　시간:　조선의　대보단과　근대의　문턱》，서울:　서강대학교출판부。Kye, Seung-bum. 2011. *Jeongji doen sigan: Joseon ui Taebodan gwa geundae ui mun teok* [*Stopped Time: The Altar of Great Gratitude (Taebodan) of Joseon and Threshold of Modern Era*]. Seoul: Sogang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桂勝範（계승범），2012，〈의병의 개념과 임진의병〉，《서강인문논총》，3: 5-37。Kye, Seung-bum. 2012. “Uibyong ui Gaenyeom gwa Imjin Uibyong” [The Concept of Ŭibyŏng and the Imjin Ŭibyŏng in Chosŏn Korea]. *Humanities journal* 3: 5-38.

桂勝範（계승범），2014，《중종의 시대: 조선의 유교화와 사림운동》，경기도 고양시: 역사비평사。Kye, Seung-bum. 2014. *Jungjong ui sidae: Joseon ui Yugyohwa wa Sarim undong* [*The Era of Jungjong: Confucianization and the Sarim Movement in Joseon Dynasty*]. Goyang City, Gyeonggi Province: Yukbi Publishing Company.

具都暎（구도영），2006，〈중종대 사대인식의 변화〉，《역사와 현실》，62: 345-376。Koo, Do-young. 2006. “Jungjong dae Sadae insik ui byunhwa” [Changes Regarding ‘Perception of Sadae’ that Became Apparent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Jungjong]. *Quarterly Review of Korean History* 62: 345-376.

權錫奉（권석봉），1986，《청말 대조선정책사 연구》，서울: 일조각。Gwon, Seok-Bong. 1986. *Cheong mal dae Joseon Jeongchaek sa yeongu* [*A Study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Jose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oul: Ilchokak Publishing Company.

金基赫（김기혁），1996，〈이홍장과 청일전쟁: 외교적 배경의 고찰〉，金基赫（김기혁）等（編），《청일전쟁의 재조명》，강원도 춘천시: 한림대학교 아시아 문화 연구소，7-51。Kim, Ki-hyuk. 1996. “Li Hong-zhang gwa Cheong Il jeonjaeng: oegyo jeok baegyeong ui gochal ” [Li Hong-zhang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A Study of Diplomatic Background]. In *Cheong Il jeonjaeng ui jaejomyeong* [*A Review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eds. Kim, Ki-hyuk et al. Chuncheon: Institute of Asian Culture Studies, Hallim University, 7-51.

金珉煥（김민환），1988，《개화기 민족지의 사회사상》，서울: 나남。Kim, Min-hwan. 1988. *Gaehwagi Minjokji ui Sahoe Sasang* [*Social Thoughts of the National Pr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Seoul: Nanam Publishing House.

金普漢（김보한），2014，〈고려·조선의 대일본 외교와 왜구: 13~15 세기 금구 외교와 그 성과를 중심으로〉，《한일관계사연구》，47: 3-34。Kim, Bo-han. 2014. “Koryeo・Joseon ui dae Ilbon oegyo wa Waegu: 13~15 segi geumgu oegyo wa geu seongkwa reul jungsim euro” [The Diplomacy of Koryeo and Choseon for Japanand Wakou: Focused on Diplomacy to Prohibi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kou and it's Productin 13~15th Century]. *The Korea-Japan Historical Review* 47: 3-34.

金相泰（김상태），1996，〈조선 세조대의 원구단 복설과 그 성격〉，《한국학연구》，6+7: 193-223。Kim, Sang-tae. 1996. "Joseon Sejo dae ui Wongudan bokseol kwa geu seonggyeok" [The Significance of Reconstructing Won-Gu-Dan Altar under King Sejo]. *The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6+7: 193-223.

金世英（김세영），1998，〈조선 효종조 북벌론 연구〉，《백산학보》，51: 121-153。Kim, Se-yeong. 1998. "Joseon Hyojong jo Bukbeol lon yeongu" [A Study on Plan for Northern Subjugation under King Hyojong]. *The Paek-San Hakpo* 51: 121-153.

金正起（김정기），1988，〈청의 조선 종주권 문제와 내정 간섭〉，《역사비평》，5: 105-119。Kim, Cheong-Ki. 1988. "Cheong ui Joseon Jongjugwon moonje wa naejeong ganseop" [The Qing Dynasty's SuzeraInty and Interference in Domestic Affairs over Joseon Dynasty]. *Critical Review of History* 3: 105-119.

金正起（김정기），1993，〈청의 조선정책(1876-1894)〉，한국역사연구회（편），《1894년 농민전쟁연구(3)》，서울: 역사비평사，31-68。Kim, Cheong-Ki. 1993. "Cheong ui Joseon Jeongchaek(1876-1894)" [Qing's policy toward Joseon]. In *1894 nyeon Nongmin Jeonjaeng yeongu* [*A Study on the Peasant War in 1894*], ed. Korean History Society. Seoul: Yukbi Publishing Company, 31-68.

金顯哲（김현철），2016，〈개항기 청의 대조선 정책〉，《현대사광장》，8: 10-28。Kim, Hyun-chul. 2016. "Gaehanggi Cheong ui dae Joseon jeongchaek" [Qing's Policy toward Joseon at the Period of Opening of the Port]. *Forum for Korean Contemporary History* 8: 10-28.

柳長根（유장근），2004，〈동아시아 근대사와 중국의 위상〉，白永瑞（백영서）等（篇），《주변에서 본 동아시아》，서울: 문학과 지성사，39-63。Yu, Jang-keun. 2004. "Dong Asia Geundaesa wa Jungguk ui wisang" [Modern History of East Asia and the Status of China]. In *Jubyeon eseo bon Dong Asia* [*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iphery*], eds. Baik, Young-seo et al. Seoul: Moonji Publishing Company, 39-63.

李光麟（이광린），1998，〈개화기 한국인의 아시아연대론〉，《한국사연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1+62: 285-299。Lee, Kwang-rin. 1998. “Gaehwagi HanGukin ui Asia yeondaeron” [Korean Alliance with Asian Neighbours in the Late Chosŏn Dynasty]. *The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61+62: 285-299.

李玟源（이민원），1988，〈칭제논의의 전개와 대한제국의 성립〉，《청계사학》，5: 261-296。Lee, Min-won. 1988. “Chingje nonui ui jeongae wa Daehan jeguk ui Sung Rip” [Gojong’s Reinforcement for Emperor’s Pow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orean Empire]. *Ch’onggye Sahak* 5: 261-296.

李秉烋（이병휴），1999，《조선전기 사림파의 현실인식과 대응》，서울: 일조각。Lee, Byung-hyoo. 1999. *Joseon jeongi Sarim pa ui hyeonsil insik gwa daeeung* [*Practical Recognize and Counteract of the Sarim Faction in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Seoul: Ilchokak Publishing Company.

李完宰（이완재），1989，《초기 개화사상 연구》，서울: 민족문화사。Yi Wan-jae. 1989. *Chogi Gaehwa sasang yeongu* [*A Study on the Ideas of Early Enlightenment*]. Seoul: Minjok munhwa Publishing Company.

閔斗基（민두기），1980，《중국 근대사 연구》，서울: 일조각。Min Tu-ki. 1980. *Jungguk Geundaesa yeongu* [*Chinese Modern History Study*]. Seoul: Ilchokak Publishing Company.

閔斗基（민두기），2001，《시간과의 경쟁》，서울: 연세대학교 출판부。Min Tu-ki. 2001. *Sigan gwaui gyeongjaeng* [*Race Against Time*].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朴元熇（박원호），1980，〈명『정난의 역』 시기의 조선에 대한 정책〉，《부산사학》，4: 93-112。Park, Won-ho. 1980. “Myung ‘Jeongnanui Yeok’ sigi ui Joseon e daehan jeongchaek” [Ming’s policy toward Joseon during the ‘Jingnan campaign’]. *History & the Boundaries* 4: 93-112.

朴元熇（박원호），1983，〈명『정난의 역』에 대한 조선의 대응〉，《아세아연구》，26(2): 179-193。Park, Won-ho. 1983. “Myung ‘Jeongnanui Yeok’ e daehan Joseon ui daeeung” [‘Jingnan Campaign’ and Joseon’s Response]. *The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6(2): 179-193.

朴元熇（박원호），2002，《명초 조선관계사 연구》，서울: 일조각。Park, Won-ho. 2002. *Myung cho Joseon gwangye sa yeong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Choson*]. Seoul: Ilchokak Publishing Company.

朴正珉（박정민），2010，〈조선초기의 여진 관계와 여진인식의 고착화: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태조~세종대를 중심으로〉，《한일관계사연구》，35: 89-121。Park, Jung-min. 2010. “Joseon chogi ui Yeojin gwangye wa Yeojin insik ui gochakhwa: Taejo~Sejong dae reul jungsim euro” [A Awareness and Relation about Jurchen in the Early Years of Chosun: from King Taejo to King Sejong]. *The Korea-Japan Historical Review* 35: 89-121.

朴正珉（박정민），2014，〈연산군~명종대 여진인 내조의 재검토〉，《역사학보》，222: 37-65。Park, Jung-min. 2014. “Yeonsangun~Myeongjong dae Yeojinin naejo ui jae geomto” [A Review of the Jurchen’s Mission to Hanyang from Yeonsangun to Myeongjong Period]. *The Korean Historical Review* 222: 37-65.

朴賢謨（박현모），2004，〈세도정치기(1800~1863) 조선의 대외정책 연구〉，《국제정치논총》，44(4): 7-26。Park，Hyun-mo. 2004. “Sedo Jeongchi gi (1800~1863) Joseon ui daeoe jeongchaek yeongu”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In-law Government Joseon, 1800-1863].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4(4): 7-26.

朴鴻圭（박홍규），2001，〈17 세기 덕천일본에 있어서의 화이문제: 중국・조선과의 비교관점에서〉，《한국정치학회보》，35(4): 282-285。Park, Hong-kyu. 2001. “17segi Deokcheon Ilbon e Isseoseoui Hwai munje: Jungguk · Joseon gwaui bigyo gwanjeom eseo” [The Center-Periphery Issue in the 17th Century Tokugawa Japan: In Comparison with China and Chosun]. *The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35(4): 282-285.

白永瑞（백영서），2000，《동아시아의 귀환》，서울: 창작과 비평사。Baik, Young-seo. 2000. *Dong Asia ui gwihwan* [*The Return of East Asia*]. Seoul: Changbi Publishers.

孫禎睦（손정목），1982，《한국개항기 도시사회경제사 연구》，서울: 일지사。Son, Jung-mok. 1982. *Hanguk Gaehanggi dosi sahoe gyeongjesa yeongu* [*A Study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Urban Areas in the Opening - port Period of Korea*]. Seoul: Iljisa Publishing company.

吳洙彰（오수창），1985，〈인조대 정치세력의 동향〉，《한국사론》，13: 49-119。Oh, Soo-chang. 1985. “Injo jeongchi seryeok ui donghyang” [The Trend of Political Power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Injo]. *Han’guk saron* 13: 49-119.

王元周（왕원주），2003，《한국근대이행기 화이관의 변화와 민족의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서울: 연세대학교 대학원 사학과 박사논문。Wang, Yuan-zhou. 2003. *Hanguk Geundae ihaenggi Hwaigwan ui byeonhwa wa Minjok uisik* [*The Variation of Hwa-Yi Thought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Early Modern History of Korea*].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Yonsei University, Soul, Korea.

尹榮寅（윤영인），2002，〈서구 학계 조공제도 이론의 중국 중심적 문화론 비판〉，《아세아연구》，45(3): 269-290。Yun, Peter I. 2002. “Seogu hakgye Jogong jedo iron ui Jungguk jungsim jeok munhwaron bipan” [A Critique of Sinocentric Culturalism of the Tribute System Model]. *The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3): 269-290.

張俊赫（장준혁），2014，〈여말선초 동아시아 국제정세 속의 대마도 정벌〉，《역사와 실학》，53: 51-85。Jang, Jun-hyuk. 2014. “Yeomal Seoncho Dong Asia Gukje jeongse sok ui Daemado Jeongbeol” [The Study of Daemado Jeongbeol due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East Asia during the Late Goryeo and Early Joseon].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Yeoksa Silhak* 53: 51-85.

全海宗（전해종），1966a，〈한중조공관계고〉，《동양사학연구》，1: 10-41。Chun, Hae-jong. 1966a. “HanJung Jogong gwangye go”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Sino 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Asian Historical Studies* 1: 10-41.

全海宗（전해종），1966b，〈청대 한중조공관계 종고〉，《진단학보》，29+30: 435-480。Chun, Hae-jong. 1966b. “Cheong dae HanJung Jogong gwangye jonggo”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Chindan-hakpo* 29+30: 435-480.

鄭東勳（정동훈），2012，〈명대의 예제 질서에서 조선국왕의 위상〉，《역사와 현실》，84: 251-292。Jung, Dong-hun. 2012. “Myung dae ui Yeje jilseo eseo Joseon gukwang ui wisang” [The Status of the Joseon King in the Ming Dynasty Ritual System]. *Quarterly Review of Korean History* 84: 251-292.

鄭杜熙（정두희），1983，《조선초기 정치지배세력 연구》，서울: 일조각。Chung, Doo-hee. 1983. *Joseon chogi jeongchi jibae seryeok yeongu* [*The Political Elite of the Early Choson Dynasty: its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Roles*]. Seoul: Ilchokak Publishing Company.

鄭玉子（정옥자），1998，《조선후기 조선중화사상 연구》，서울: 일지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ung, Ok-ja. 1998. *Joseon hugi Joseon Junghwa sasang yeongu* [*The Korea Chunghwa Thought in the Late Choson Dynasty*]. Seoul: Iljisa Publishing company.

鄭容和（정용화），2004，〈사대・중화질서 관념의 해체과정〉，《국제정치논총》，44(1): 95-115。Chung, Yong-hwa. 2004. "Sadae Sedo · Junghwa jilseo gwannyeom ui haeche gwajeong" [Changing Process of Sino-centric Idea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4(1): 95-115.

池斗煥（지두환），1987，〈조선후기 예송 연구〉，《부산사학》，11: 77-125。Ji, Doo-hwan. 1987. "Joseon hugi Yesong yeongu" [A Study on Political Discussion about Customary Code of Mourning Dress in the Later Chosun Dynasty]. *History & the World* 11: 77-125.

車周泳（차주영），2004，《16 세기 사림세력의 집권과정과 정치성향》，서울: 상명대학교 대학원 사학과 한국사전공 박사논문。Chah, Joo-young. 2004. *16 segi Sarim seryeok ui Jipgwon gwajeong gwa jeongchi seonghyang* [*The Rise and Domination of Sarim Power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its Political Ideology*].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angmyung University, Soul, Korea.

崔韶子（최소자），1997，〈18 세기 후반 『연행록』을 통해 본 조선지식인들의 대중국인식〉，《국사관논총》，76: 191-223。Choi, So-ja. 1997. "18 segi huban 'Yunhangrok' eul tonghae bon Joseon jisigin deului dae Jungguk imsik" [A Study on Joseon Intellectuals' Perceptions of China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An Analysis of the 'Yunhangrok' (燕行錄)]. *Kuksagwan Nonchong* 76: 191-223.

崔承熙（최승희），2005，《조선초기 정치문화의 이해》，서울: 지식산업사。Choi, Sung-hi. 2005. *Joseon chogi jeongchi munhwa ui ihae*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Seoul: Jisik-Sanup Publications Company.

河宇鳳（하우봉），2003，〈조선전기 대외관계에 나타난 자아인식과 타자인식〉，《한국사연구》，123: 247-270。Ha, Woo-bong. 2003. "Joseon jeongi daeoe gwangye e natanan jaa insik gwa taja insik" [Self-percep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Others Shown in the Foreign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The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123: 247-2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국사편찬위원회），2015，〈朝鮮王朝實錄〉，朝鮮王朝實錄 (조선왕조실록) 網頁，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2019/10/29。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2015. “Chao xianwang chaoshi lu” [The Annals of the Joseon Dynasty]. in 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 Latest update 29 October 2019.

韓明基（한명기），1999，《임진왜란과 한중관계》，서울: 역사비평사。Han, Myung-gi. 1999. *Imjin waeran gwa Han Jung gwangye* [*Imjin War and Korea-China Relations*]. Seoul: Yukbi Publishing Company.

韓明基（한명기），2003，〈병자호란 패전의 정치적 파장〉，《동양학지》，119: 53-93。Han, Myung-gi. 2003. “Byeongja horan paejeon ui jeongchi jeok pajang” [The Political Effect of the Surrenderof the Pyeongja Horan]. *The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19: 53-93.

韓文鍾（한문종），2004，〈조선전기 일본국왕사의 조선통교〉，《한일관계사연구》，21: 5-36。Han, Moon-jong. 2004. “Joseon jeongi Ilbon gukwang sa ui Joseon tonggyo”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King’s Envoys of Choson and Japan in the Early Choson Dynasty]. *The Korea-Japan Historical Review* 21: 5-36.

韓文鍾（한문종），2011，〈조선의 남방지역과 일본에 대한 경계인식〉，《한일관계사연구》，39: 131-158。Han, Moon-jong. 2011. “Joseon ui nambang jiyeok gwa Ilbon e daehan gyeonggye insik” [Vigilance toward Joseon's Southern Districts and Japan]. *The Korea-Japan Historical Review* 39: 131-158.

韓文鍾（한문종），2013，〈조선전기 한일관계와 대마〉，《동북아역사논총》，41: 61-96。Han, Moon-jong. 2013. “Joseon jeongi Han Il gwangye wa Daema” [Relations between Joseon and Japan in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and Tsushima]. *Dongbuga Yeoksa Nonchong* 41: 61-96.

韓文鍾（한문종），2014，〈조선시대 대일사행과 대마도〉，《한일관계사연구》，49: 311-351。Han, Moon-jong. 2014. “Joseon sidae dae Il Sahaeng gwa Daemado” [Korean Envoys to Japan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sushima during the Choson Dynasty]. *The Korea-Japan Historical Review* 49: 311-351.

韓成周（한성주），2006，〈조선초기 수직여진인 연구：세종대를 중심으로〉，《조선시대사학보》，36: 67-108。Han, Seong-joo. 2006. “Joseon chogi sujik Yeojinin yeongu: Sejong dae reul jungsimeuro” [A Study on the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Received the Office of Jurchens in the Early Chosun Dynasty-Focused into Sejong Period]. *The Journal of Choson Dynasty History* 36: 67-108.

韓成周（한성주），2007，〈조선초기 조,명 이중수직여진인의 양속문제〉，《조선시대사학보》，40: 5-43。Han, Seong-joo. 2007. "Joseon chogi Jo, Myeong ijung sujik Yeojinin ui yangsok munje" [A Study on the Jurchens Who Were Dually Appointed from both Chosun and Ming in the Early Chosun Dynasty]. *The Journal of Choson Dynasty History* 40: 5-43.

韓成周（한성주），2009，〈조선전기 '자소'에 대한 고찰: 대마도 왜인 및 여진 세력을 중심으로〉，《한일관계사연구》，33: 203-236。Han, Seong-joo. 2009. "Joseon jeongi 'Jaso' e daehan gochal: Daemado waein mit Yeojin seryeog eul jungsimeuro" [A Study on 'Ja-so' at the Former Term of the Joseon Dynasty: Focused on the Japanese at Tsushima and Jurchens force]. *The Korea-Japan Historical Review* 33: 203-236.

韓成周（한성주），2010，〈조선전기 두만강유역 '여진 번리・번호'의 형성과 성격〉，《한국사학보》，41: 163-201。Han, Seong-joo. 2010. "Joseon jeongi Dumangang yuyeok 'Yeojin Beonri · Beonho' ui hyeongseong gwa seonggyeok"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urchen Fence · Boundary Jurchens' in Tumen River basin]. *The Journal for the Studies of Korean History* 41: 163-201.

韓成周（한성주），2012，〈조선전기 두만강유역에 나타나는 두 개의 '조선'〉，《명청사연구》，37: 245-273。Han, Seong-joo. 2012. "Joseon jeongi Dumangang yuyeok e na tananeun du gae ui 'Joseon'" [Two of the 'Joseon' in the Tumen River basin in early Joseon]. *Journal of Ming-Qing Historical Studies* 37: 245-273.

韓成周（한성주），2014，〈조선 변경정책의 허와 실: 두만강 유역 여진 번호의 성장과 발전〉，《명청사연구》，42: 159-186。Han, Seong-joo. 2014. "Joseon Byeongyeong jeongchaeg ui heo wa sil: Dumangang yuyeok Yeojin Beonho ui seongjang gwa baljeon" [Weakness and Firmness of Frontier Policy in Jose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Boundary Jurchens of Jurchen in Tumen River basin]. *Journal of Ming-Qing Historical Studies* 42: 159-1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西文部分

Chun, Hae-jong. 1968. “Sino-Korea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0-111.

Clark, D. N. 1998.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under the Ming”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2*, eds. Denis C. Twitchett & Frederick W. Mo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72-300.

Deuchler, M. 1992. *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 A Study of Societ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uncan, J. B. 2000. *The Origin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Geiss, J. 1988. “The Chia-Ching Reign, 1522-1566.”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1*, eds. Denis C. Twitchett & Frederick W. Mo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0-510.

Kye, S. B. 2004. “The Posthumous Image and Role of Ming Taizu in Korean Politics.” *Ming Studies* 50: 107-130.

Kye, S. B. 2010. “Huddling under the Imperial Umbrella: A Korean Approach to Ming China in the Early 1500s.”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5(1): 41-66.

Mote, F. W. 1999.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 K. R. 2000. “Centering the King of Chosŏn: Aspect of Korean Maritime Diplomacy, 1392-1592.”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1): 109-125.

Walker, H. D. 1971. *The Yi-Ming Rapprochement: Sino-Korean Foreign Relations, 1392-1592*.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lifornia, L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Study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the Issue of 'De-Siniciza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Byungbae Park***

Abstract

The Korean perception of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is 'China as a regional hegemon.' The second is China as the basis of the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power. The third is 'China as a cultural system.'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Korea tried to modernize itself as it escaped from the China-centered tributary system, and it externally became an independent nation. However, there we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issue of the 'de-chinization' process among the Korean society of the age, and how they accepted the civilizational discourse. Firstly, the radical reformists argued for total and complete de-chinization, pointing out that they identified China as a regional hegemon as being tied to China as a cultural system, and they argued that these factors disturbed Korean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contrary, the Confucian elites of the moderate reformists completely separated the China that is a regional hegemon from the China that is the cultural system, and they argued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belong to a universal civilization. Furthermore, the Joseon Dynasty (朝鮮王朝) changed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to the Korean Empire (大韓帝國) and tried to show that it's a universal civilized country and an independent nation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based on this awareness.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orean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the de-chinization of issues in the 19th century.

Keywords: China, Joseon Korea, Consciousness of Little-China (小中華意識), De-Chinization, Civilization

---

* DOI:10.6166/TJPS.201912_(82).0002

**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easianpark@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